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12月31日第23期 总第14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1968年12月22日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发表45周年。本刊特出此辑。

《记忆》146期

知青专辑(一)

目录

【专稿】

任国庆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民族灵魂之管窥

马昌海 知青维权——漫漫回京路

【评论】

慰祖 失实的艺术——电视剧《知青》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知青描写

【述往】

季超男 北大荒记忆

1. 查夜

2. “把×××揪出来！”

3. 运动——“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

齐人 祭北大附中知青沈因立——他死在山西榆次

【年终小结】

【2015年总目录】

【版权声明】

【专稿】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

——民族灵魂之管窥

任国庆（美）

零. 题记

邓贤在他的《中国知青梦》一文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

本文作者说：其实那也是对民族灵魂的一次窥伺。

邓贤接着写道：“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本文作者说：真的吗？我没有看到。

一. 起因再思考

在历史事件中，再也没有比起因包含了更多的本质因素的了。然而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却历来扑朔迷离，众说不一。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而言，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兔死狗烹说

这个观点最早见于贺文的文章《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¹。这种观点认为，到1968年底，“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已经被打倒，这标志着红卫兵的政治使命已经结束。然而红卫兵的革命激情依然在燃烧。破四旧，揪斗“黑五类”，打砸抢，武斗都在继

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2b116f750102vnhn.html（2015年12月20日检索）

续。怎样化解掉红卫兵这个群体如此巨大的破坏力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把他们送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农村去，给他们摘掉“革命闯将”的桂冠，带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紧箍咒，就成为必要。

与此观点貌似相反，实则相同的说法还有：

内蒙卫视 2008 年拍摄的电视片《曾经草原》认为：“红卫兵运动只有一年，轰轰烈烈的革命激情要寻找新的出口。”

无独有偶，著名的上山下乡先行者曲哲也有与内蒙卫视的观点相类似的表述：“当时我们下乡，解决了上面需要解决而难于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红卫兵这么一支政治力量怎样去消解它。”

虽然贺文与内蒙卫视、曲哲对红卫兵运动的价值判断相反，贺文的观点明确对红卫兵运动执否定态度，而后者对红卫兵运动却委婉肯定，然而读者可以清楚看到，两种观点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出了“兔死狗烹”的相同逻辑。

（二）整顿治安说

由于文化大革命全面停课，使得总共六届中学生，四届大学生闲散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全国城镇纷纷出现许多流氓团伙。他们结帮成伙，打架斗殴，偷盗成风，大搞流氓活动，严重威胁着社会治安，使得城市人民生活秩序受到极大干扰。这种观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遣散这些人，以整顿社会治安。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毛泽东“12.22 指示”下达后，六届中学生（66、67、68 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即被送往边疆、农村，全国各大城市的治安立即得到很大改善。

（三）就业说

到 1968 年年底，文化革命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这三年全国小学，中学，大学全部停课。学校里积存的 66、67、68 届初、高中毕业生达 400 万之多。由于文化大革命工厂停产，生产全面萎缩，使得社会未能给这么多的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学生无法就业，小学生无法升学。学龄前的娃娃已经超过 10

岁了，依然无法入学。升学——毕业——就业的流程被彻底堵塞，形成了一个“死锁”。

许多学者在思考、总结上山下乡运动成因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强调“就业说”的重要性，政府专职部门也不例外。最具代表性的是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到目前为止，这个文件依然是官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结论。

文件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¹

如上三种原因，显然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直接后果。无论哪一条成立，都可以认为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挽救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四）备战说

40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已时过境迁。在思考上山下乡运动起因时，当时人人都能够感到的紧张的战争气氛却很少被人们提及。

且不管中苏冲突的是非曲直，那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近年来披露的史料显示，在60年代中后期苏联确实对中国存在着战争的威胁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有效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允许苏联在蒙古国驻军。这意味着，中苏之间的蒙古国这个天然屏障不复存在了。这使得苏联军队攻击北京的距离减少了1000公里！并且可以随时出击。自1966年起，苏联在蒙古境内的机械化部队的纵深能力可达700公里。而北京到中蒙边界距离仅仅是560公里。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随后发表了“有限主权论”。“有限主权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限制，其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这不异于向全世界宣布，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有资格随时入侵其

¹ 中共中央国务院知青办文件《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981年10月。

他社会主义国家。

近几年多方披露的资料显示，苏联确有对中国的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攻击的企图。这一点在30年后发表的《基辛格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战争的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重要工业企业纷纷迁往内地。学校，机关的建筑物下都挖成了防空洞，城市居民的门窗玻璃都贴上了“米”字以预防空袭。预防核爆炸，和空袭有关的各种课程在党政机关，工厂，学校，甚至街道广泛展开。各种军事演习，防空演习的警报频繁地回响在中国的大地上。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指示（后被成为“12.22指示”），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稍后，从1969年到1970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国组建了11个生产建设兵团。加上原来的新疆建设兵团，一共12个建设兵团，和三个农垦师，分别分布在18个省和自治区。

它们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西藏农垦师、广西农垦师、江西农垦师。

这些建设兵团都是在现役军人领导下，以知识青年为主体。同“插队落户”相同的是，兵团也是上山下乡的一个主要形式。从69年到71年战备最紧张的三年中其总人数为127万，占同时期上山下乡总人数的约29%。¹

这些资料显示，中国正在为一场现代化战争紧张地做着准备。因此，“备战说”的观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为战争疏散人口，储备兵员。

然而，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5期的文章《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认为：“1969年‘珍宝岛事件’是中国一方策划的政治行为。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看

¹ 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便突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转移国内矛盾，消除派性，稳定国内形势。”¹

另外，也有文章以赞扬毛泽东的角度提出相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革’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²

尽管这种观点对毛大加赞扬，但却直接质疑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和备战的真实性，进而对“备战说”构成了强烈的质疑。如果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为了抵御侵略，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则是合情合理的国家行为。但是如果为了缓和文革所造成的国内矛盾，转移人民视线而蓄意挑起战争，或故意制造战争爆发气氛而发动运动，则实属玩弄国民于鼓掌之上的祸国殃民行为。近年来更多的史料发现，这种观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退一步讲，即使在“12.22”指示下达之时确实存在战争威胁，“备战说”也只不过是上山下乡运动被发动的原因之一。但事实是，在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跟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谈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很快得到缓解。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已经消除。这一点在俄罗斯学者贡恰罗夫的文章中得到确认。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双方离开了全面冲突的边缘，使苏中关系从灾难性冲突的道路转入了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竞争的轨道。”³

此种事实的另一个证据则是林彪秘书张云生在《谈林彪“一号令”》的回忆文章中讲到，在69年年底林彪一号令发布不久，林彪认为苏联实行突然袭击的可能已经解除，并且明确表示“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

¹ 《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俄〕C·贡恰罗夫，B·乌索夫著。《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² 《珍宝岛之战苏联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http://w.baike.com/92ae3ddb744845ceb5b84cd436d5026d.html>（2015年12月22日检索）

³ 《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俄〕C·贡恰罗夫，B·乌索夫著，马贵凡译，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0715/12484381_6.html（2015年12月23日检索）

如此说来，如果备战是发动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那么上山下乡应该止于1970年年初。但事实是在1970年后，特别是73年再次掀起新的高潮，大批知青依然陆续不断地被送往农村、边疆。显然备战只可能是上山下乡运动发动的原因之一，而不是70年后持续的原因。上山下乡持续的原因只能在备战之外去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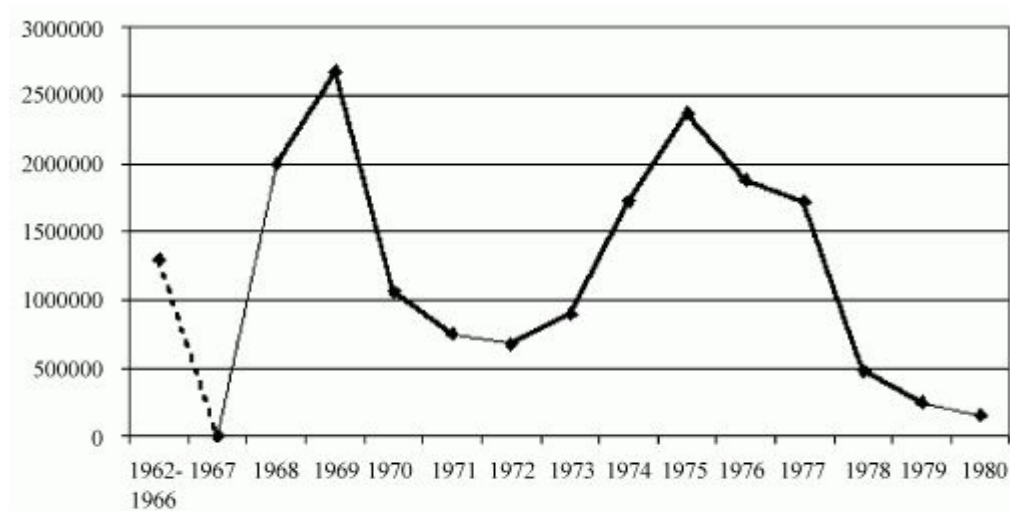


图1 1962 - 1980 年知青下放情况

(五)，再教育说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说法是毛泽东的首创，也是毛泽东在他的“12.22”指示中对他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原因所作的唯一解释。不知道这种以“知识定罪”或者“知识分子原罪说”在中国起源于何时，也很难在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类似的提法和它的理论依据。令人费解的是在毛泽东那里，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体理念中，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改造，是一个无需论证，也不容争辩的共识。

仅就当时所显示的事实而言，毛泽东回避了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所难以回避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军事问题”的实质，而以一个精神领袖，甚至类似于一个宗教领袖的身份将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摆脱社会困境的手段表达成一种青年人道德以及人格自我完善的精神诉求其欺骗性是难以逃避的。

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毛泽东自己是否真诚地相信，今天任何人都既无

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然而逻辑所作出的判断是无法逃避的：真诚，质疑的是他的智力。不真诚，质疑的是他的道德：

如若真诚，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对于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否思考过，乃至是否思考清楚了？

这些问题应该是：

- 1， 知青为什么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究竟有哪些教育缺失？
- 2， 为什么这些教育缺失不能够在学校里完成，要到乡下去完成？
- 3， 为什么贫下中农可以给他们补足这些教育缺失？
- 4， 他们下到农村去后，跟农民的基本关系是怎样的？
- 5， 贫下中农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们？
- 6， 他们有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 7， “再教育”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 8， 他们是否要扎根农村一辈子？

等等。假如他对这些问题思考过，甚至思考清楚了，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理性的，头脑清楚的人。“上山下乡”运动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假如他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只是一种市井匹夫匹妇的诸如“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之类的感觉，而没有任何实地考察的依据，没有任何理论支撑，那么我们也有理由得出结论：毛泽东不是一个理性的，头脑清楚的人。“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的前提——如若他对自己的理论是真诚相信的话——那么他也是属于后者：不是一个理性的，头脑清楚的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思考过这些问题。事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沉醉于语焉不详带来的高深莫测神秘效果，以上帝的姿态，《圣经》体的语言，寥寥数语便完成了这个理论的全部阐述。并且在后来的实践中当如上问题一一出现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破产。

今天体味起这个过程来，颇具喜剧效果。不禁让人想起拿破仑的话：“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如上一切还都仅仅是智力问题，能力问题而已。

如若不真诚，那么，以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为依据，发动一场那么大的运动，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人民就是欺骗！逻辑所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两种：

- 1， 他对人民依然忠诚——这是最为善意的理解。欺骗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解决重大危机，理由如果直言告诉人民则会给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接受再教育”只是顺手抓来的一个由头。如果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至少在上山下乡这件事上，他一贯对外宣讲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等等人民观的表述都并非发自肺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思想才是他真实的人民观。“权使其士，虏使其民”，阴谋为体，强权为用则是方法论。
- 2， 他已经失去了对人民的忠诚，他个人成败同人民的利益已经背道而驰，在人民利益和个人成败之间做选择，他选择了牺牲人民利益！

言及对人民的“忠诚”，不能不说毛“12.22”指示里面的一句话：“来一个动员”。时值1968年12月，疾风暴雨样的红卫兵运动刚刚稍有停歇，“红色恐怖”尚未结束，各地对“走资派”，对“黑五类”怎样严刑虐待，以至虐杀。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年代，毛说这句话究竟要他的百姓们干什么，毛心里是清楚的。然而这次对待的却不是少数人的“走资派”和“黑五类”，而是城镇人民的绝大多数。基于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对人民的忠诚呢？

不管毛对其理论是否相信，这一说法直接界定了知识青年的“被改造”的社会地位是无庸置疑的。在知青运动中所造成的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和捆绑吊打虐待知识青年的种种事件的后果，都跟知青“被改造”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成因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多重因素够成的。如上所列五种或许并没有穷尽这一运动的所有成因。仅就这五种而言，也不应当是单一存在、相互排斥、非

此即彼的。而应当是几种因素并存不悖的。

如上所述，随着大批知青下乡，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就已经渐渐消于无形，社会治安也大大好转了，由是（一）兔死狗烹说，和（二）整顿治安说已经不复存在；当1970年“柯周会谈”之后战争威胁已经消除，亦由是，（四）备战说也不复存在了。

至此，上述的五个起因中只剩下“就业说”和“再教育说”两个动因存在了。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上山下乡运动所制造的社会问题，以及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就业问题本身，显然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举措。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对于毛泽东的“再教育”理论没有人敢于质疑，全党的官员为了自身利益争相鼓吹，竞相执行，推波助澜才使一个明知走向失败的运动愈演愈烈。因此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运动，却是全党和全民族的失败和悲哀。

二．知识青年的界定

这里探讨的知识青年，特指在文化革命期间下乡的，特别是指在毛“12.22”指示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尽管文革前也有下乡的或者回乡的知识青年，但他们在下乡的起因，目的和性质等方面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有非常大的区别，本文且不做探讨。

虽然毛泽东在他的“12.22”指示中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但实际上知识青年不包含大学生。

从毕业年限上划分，知青包括从66年高中毕业生以降，直至79年高中毕业下乡的城镇学生。他们是：

66、67、68届高中毕业生。

66、67、68、69、70、71、72、73届初中毕业生。

76、77、78（有的地区包括79届）届高中毕业生。这3届高中学生实际上与74、75、76三届初中毕业生是同一批人。到他们初中毕业时，已经普遍实行高中毕业分配的政策。

当时高中实行两年制，所以他们高中毕业的年限应该在他们初中毕业年限上往后顺延了两年。当然全国各地实行高中下乡政策的年份互有参差。因此，有的地区没有72届或73届初中毕业生下乡，但这两届学生在两年后作为74、75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尽管如此，这一点细节并不影响我们界定知青群体外延。因此，知青是由连续的14或15届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所构成。

从1968年到1979，如上文所谈到的14届城镇毕业人口总数约2700多万。下乡知青人数是1647万。知青人数占14届城镇学生总人口的61%。

三. 知青的受教育状态

尽管当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基础教育”概念的理解没有一个统一定义，“基础教育”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实行多长时间等等，问题不同的国度也各有不同理解。然而从具体实施角度看，高中毕业，或者完成12年教育被视为完成基础教育标准，大约是没有争议的。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识青年，他们呈现如下状态：

1966届高中毕业生完成了基础教育，这是没有争议的。以此为起点按年龄顺序往下推延，直到1979年，毕业年限每晚一年，他们接受基础教育时间就减少一年。

1967年有些情况较为特殊，那年末有一个“复课闹革命”。此时中小學生被召回学校。然而这并没有给他们重新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当时教育界正在集中批判“白专道路”。“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一条国家理念，教师们都已经成为了“臭老九”而威风扫地。学校门窗桌椅都已经被砸烂。上课的内容除了极少时间用来学习毛主席语录之外，更多的时间是揪斗老师和校长，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此时旧的教材已经被打成反动教材，而新的教材还没有出现。可以认为这次“复课闹革命”并没有完成基础教育的任何课程。到71届和72届初中生下乡时，他们只受过3、4年小学教育，基础教育的识字课程还没有完成。

全国各地参差不齐，分别在1972年到1973年先后开始“普及高中”教育。此时，实

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毛主席指示。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和高中分别都由原来的三年制改为两年制。同原来的教育体制相比，此时“高中毕业”的在校时间跟原来的“初中毕业”在校时间一样，都是9年。按照平均年龄7岁入学，到他们下乡时也只有16岁，还是未成年人。不同的只是原来的叫做“初中毕业”，此时叫“高中毕业”。

72、73年以后“普及高中”的学生的教育状态更差。文革开始时他们只有小学2、3年级，比他们再晚的学生还没有上小学。他们从识字开始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识字只是灌输革命思想的手段，他们的语文水平比起文革前接受完整小学教育的学生要差很多。

到他们进入中学时，恰逢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批转了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报告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1969年和1970年城镇学生升入中学时，他们学的就是这五门课，再加一门工业基础知识。

尤其是1973至1977年高中生下乡时，他们有着过多的畸形政治知识，过少的文化知识。知识水平介于文盲和半文盲之间。许多人下乡后连家信都还不会写，一时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知青家信错别字的笑话，实际上正是一代知青知识现状的真实写照。

这种知识分布在后来知青回城后就业，以及知青下岗中都得到了强烈的印证。当大批知青势不可挡地回到城市以后，年龄虽然偏大，但受教育程度较好的“老三届”相对容易地找到了较好的工作。相反年纪较轻，而受教育差的69届以下的知青们大多数都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当90年代大批城市工人下岗时，年龄较大的“老三届”能够依赖他们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而多数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位置。而年纪较轻的69届以下的知青却普遍地失去工作机会。受教育机会被剥夺，使他们终生失去了在商品社会中的竞争能力，从他们被剥夺受教育机会那一天开始，就决定了今天他们只能艰难地挣扎在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命运。

四．下乡的强迫性

著名知青历史研究者刘小萌先生在他的《中国知青史》中这样描述“老三届”下乡前的精神状态：“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当我们把所关注的对象对准“老三届”群体，而不是“老三届”的个别人物时，便会发现如上描述不仅仅大失于真实，而且大失于肤浅。且说“老三届”参加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参与红卫兵运动的老三届，充其量也只是一部分人，（多数是名校当中的所谓“优秀”生），而不是大多数。另外积极参与红卫兵运动的“老三届”其目的也绝不是“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积极参与文革的动力，对于多数人来讲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嫉妒心、虐待欲和破坏欲的群体爆发。他们在文革中的恶行，都是潜藏在他们内心，早就想做，但因缺乏合法性而不能做的。至于“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及“永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等等口号都只是满足自身暴力欲望的堂皇借口。

至于下乡却又同红卫兵运动大不相同。

从“人民公社化”开始，国家把中国全体公民依据获取生存资料方式不同而划分成了两个等级：从事农业劳动的叫做农业人口，其余叫做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并没有放弃从事农业劳动，选择非农业劳动的自由。从此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被绑缚在并不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上，使得他们离开土地便无法生存。由此中国农民失去了自奴隶社会解体以后数千年来始终具有的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

中共建政后照搬苏联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使得这两个等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准相差悬殊。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比例据官方统计 1967 年是 1：2.26（《失落的一代》作者潘鸣啸），这仅仅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对于了解城乡状况的人而言其差异恐远非如此。除此消费比例之外还有，城市人口享有的以商品粮供应为代表的许多特供

商品；优越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与“面朝黄土背朝天”强体力劳动形成鲜明对照的工业生产劳动方式等等，等级差异，何啻云泥！

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两个等级的尊卑不等。农业户口就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成为中国全体农民可望不可即的终身理想。上山下乡毫无疑问意味着知青们将失去“城市贵族”的地位，而沦落为低等级的农民。虽然他们在理性上不一定认识到这是等级身份的贬黜，但本能上的恐惧和反抗是知青群体的深层心理反应。

“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和“矢志以求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在“老三届”某些人那里或许是存在的，但若说这是“老三届”的群体理念则与事实相距甚远。

刘小萌先生的说法高估了“老三届”群体对“革命理想”的忠诚，低估了人性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强迫性。

上山下乡运动的强迫性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在他的“12.22”指示中说“来一个动员”，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年代是不言而喻的。

毛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大城市的政策基本一致：66、67、68届初中，高中共六届学生“连锅端”，一个不留。其中包括独生子女，父母有病需要子女照料的，或本人有严重疾病不适合农村生活的都没有例外。

仅以天津为例，毛指示下达后第二天就全面掀起了动员高潮。普遍的做法是办“九结合学习班”。所谓“九结合”是由这样的九个方面的人员构成：

- 1， 被动员的学生本人；
- 2， 被动员学生的父母；
- 3， 外校红卫兵；
- 4， 学校革委会和工宣队；

- 5, 军宣队代表;
- 6, 父母亲单位革委会领导;
- 7, 街道居委会;
- 8, 当地派出所;
- 9, 医院医生。

这九结合是精心搭配的，他们可以解决动员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首先，父母亲单位对被动员对象的父母停职、停薪，直到自愿报名下乡为止。这是以剥夺生存资料为威胁的手段，当时俗称“端鸟食罐”。如果父母亲有病需要照顾，或者被动员对象本人有病，医生代表当场进行体检，结果不言自明，有多么严重的病也会被证明无病。一旦没有理由仍然拒绝报名，红卫兵当即跟上，三班倒昼夜24小时“熬鹰”、家门前贴大字报、批判、戴高帽，游街、批斗、毒打、抄家。从强迫手段来看，其惨无人道不亚于“老三届”揪斗“牛鬼蛇神”。不同的是揪斗“牛鬼蛇神”只有青少年学生参加，而动员上山下乡参加者则包括教师、军人、工人、干部、医生、家庭妇女、警察等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他们的凶残和狡诈比红卫兵更胜一筹。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家中也有自己的子女被迫下乡，甚或也处在被动员的地位，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在动员别人时有稍微的同情、手软，而是相反，正因如此他们反而更加凶残。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有一杆崇高的旗帜，多么卑鄙的事情都能够做出来。

此类动员在全国各个城市纷纷出现，其形式虽有小异，实质没有例外，都是强迫不报名的人报名，逼迫不自愿的人自愿。

如果动员者真诚地认为自己在干着一件正义的事业而兴奋，而残忍，而快乐，那么不管上山下乡还是文革多么残忍，给民族，国家带来何等灾难，我们也能够从中感到一丝安慰，因为那毕竟还有一分真诚，一分崇高，一份良好的愿望，那能够算得上真正的悲剧！然而当你了解全部事实之后会大失所望：动员者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感到自豪。甚至他们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做着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一点跟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

抄家，让他们家破人亡完全一样，使他们愉快得战栗的原因是他们能够打着堂皇的旗帜把别人送上祭坛！

当年“老三届”把“牛鬼蛇神”送上了祭坛，紧接着“六九届”又把“老三届”送上祭坛，不久，下一届学生又把“六九届”送上祭坛。给予卑鄙的心灵一杆崇高的旗帜，运动就能如火如荼势不可挡。这不仅仅是上山下乡运动能够发动的奥秘，也是文化大革命乃至共产革命中任何一次运动发动并取得成功的奥秘。

五. 谁养活了插队知青？

知青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插队落户，大约占下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另一部分是兵团，1975年以后陆续改为农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兵团是供给制或者工资制。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着兵团的运转，这里不做讨论。

对于插队落户的知青而言，他们跟当地农民的经济关系，在生活资料分配和生产资料占有方面是侵占者和被侵占者的关系。

当时中国广大农村都处在粮食匮乏的状态。任何一个生产队的土地都是一个有限的定量，知青的到来不仅仅不会增加土地，也不会增加土地的产出，甚至由于知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他们从感情上对农业劳动的厌恶、蔑视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不负责任，反而会造成减产。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较为复杂。由于地域广大，各地也有不少差异。但以工分制为基础，按劳分配的基本框架是完全一致的。仅以河北省承德地区为例，可见一斑。

农民的收入基本是两块：口粮分配（以粮食为主，包括柴火、蔬菜、食物油等农副产品）和分红（现金分配）。

口粮分配又分为两部分：

1， 基本口粮。这是按照人头配给的粮食供应额度。按年计算，多数地区成人每人

300斤，未成年人250斤。值得提醒的是这个数字指的是“毛粮”，即带皮的粮食（稻子，麦子，谷子，高粱，玉米等）。把毛粮加工成可以食用的粮食前者和后者的比例是1:0.75左右。以这个比例计算，成人一年的基本口粮只能加工成225斤可食用粮食，每天只有6.1两，可见这只能是维持生命的最低食物供应量。基本口粮首先来源于农民所在生产队的产出，如果生产队产出不够分配基本口粮，国家则以平价补足基本口粮的数量，其补充部分叫做“返销粮”。基本口粮的价格是国家规定的平价粮食，生产队产出的基本口粮农民是用工分折合成现金购买的；返销粮是要农民掏现金购买的。

- 2, 工分粮。即根据劳动所得工分之多少所分得的粮食。这部分直接跟生产队产量挂钩，产量高就可以多分，产量少则少分。生产队所产的粮食第一要保证基本口粮，其次是保证完成上缴公粮的指标，再次才是工分粮的分配。即所有产量减去基本口粮，再减去公粮，把所剩数量平摊到每一个工分上，分配给工分所有者，这部分粮食农民也是用工分折合成现金购买的。

分红即生产队现金分配。现金来源是交售公粮和出售农副产品所得。

如上所述，知青到来使得工分总数增加了，而粮食产量，和农副产品数量却有减无增，会导致如下情况发生：

- 1, 本来所产粮食够基本口粮分配的，由于知青到来导致基本口粮不够分配，农民还要出钱购买“返销粮”。
- 2, 知青到来导致工分粮分配减少。人均所能吃到的粮食减少。
- 3, 交售公粮数量减少，使得现金总收入减少。
- 4, 工分总数增加，工分贬值。分红减少。
- 5, 农副产品分配减少。

因此知青的到来就是抢了农民的口粮，抢了农民的钱。

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虽然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生产队农民只拥有使用权，显然知青

到来平分了他们的使用权。此外，虽然知青每人都有国家分配的购置农具的资金，然而那些资金只够购买个人用小件农具，如镰刀，铁锹，锄头之用。而大型农具，如拖拉机等大型机械，大车，大牲畜、耧、犁、耨、耙大型农具等，以及农业基本设施，如水井，水库，磨坊，油坊等，则都是生产队长期积累的资产，所有权属于农民，不属于知青。知青到来均分了这些生产资料，实际上是侵占了农民的生产资料。

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下，知青的到来已然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对于饥寒交迫的农民不啻雪上加霜。毛主席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他们“跟贫下中农划等号”，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若不参加劳动，就是表现不好，则对农民利益侵害最小；他们干的越多，表现越好，对农民利益伤害越大。毛主席的要求和农民利益形成了对立。这种状态不仅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甚至大力鼓吹者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到，没有看到的。没有疑问这是上山下乡运动最后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上山下乡运动推行的13年中，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来维持着运动进展的，是农民养活了知青。

知青下乡同时也给知青父母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于知青并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其劳动能力无法跟当地农民相比，加上知青的“城市贵族”的心态，使得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能够像当地农民一样自己养活自己。所欠缺部分责无旁贷地落到了知青父母的头上。家有一名知青，就如同一个“无底洞”。每年探亲往返路费，衣物置换，生活费用，携带物品等等花销，使得每一个知青家庭不堪重负。

上山下乡表面上看来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实际上不过是把城市就业的危机转嫁给了农民和知青家长。

六. 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

似乎毋庸置疑，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了文明。但在上山下乡运动发动40年后的今天

重新思考时会发现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这一说法究竟能否成立首先取决于如何解读“文明”。

笔者认为，文明的终极价值在于对人性（human nature）的解放。数千年世界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性逐步被解放的过程。从大的历史趋向看，文明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若以这样的解读作为文明的标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知青是否具有文明？因为只有他们具有文明，才能给农村带去文明。

如前所述，在知青出生、成长直到他们下乡的年代里，中国跟世界文明的发展是相隔绝的。就整个群体而言，知青缺少科学知识。他们的世界观来自于国家主流教育所灌输给他们的单一的、被扭曲的伪共产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来自于“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等机械的，荒谬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虽然他们对这些已然荒谬无稽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一知半解，但他们随时都会用这些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残忍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他们坚信不疑的真理，盲目地对毛的个人崇拜成为了他们的共同信仰。这就是知青的基本文明状态。然而这些跟世界文明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

此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知青比起虽然文化知识缺乏，虽然愚昧但依然保持着本真天性的农民来，孰优孰劣殊难确定。因此说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也就失去了依据。

对文明的另一种解读是把文明理解为“文化知识”。以这种解读去解释“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从一定程度讲言之成理。特别是知青中的“老三届”，他们受过较为完整的基础教育。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在当地农村有着一定的优势。他们在下乡期间对农村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是不容否定的。然而对全体知青却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69届”以下的知青，他们自己只有小学以下的文化知识，给农村带去他们自己都不具有的文化知识也是不可能的。

再有一种对文明的解读则是所谓的“城市文明”。其实在“城市文明”这个概念中理所当然的包括了两个不同的内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生产方式则是生活方式物质基础，生活方式是依赖这个物质基础而存在的。笔者相信，这种对文明的解读所指的应当是

城市的生活方式。

当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学生进入农村时，不同的文化影响是互相的，不是单向的。当“城市生活方式”一经来到农村，便已经失去了它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进而也就失去了它自身。虽然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追求优越的生活方式的原始动力，然而这种动力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物质基础的限制。

农村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是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下乡知青没有能力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而且虽然挣扎，却难以逃脱连同自己也一起陷入了这种依附关系之中。因此当下乡知青所带去的“城市生活方式”跟当地农村的“本地生活方式”发生碰撞时，后者虽然落后，然而立即显示出它“强势文化”的优势，而“城市文化”的力量显得极其微弱和不堪一击。

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是，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是要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正是当时大力提倡的优秀品格。而对于知青的要求则是“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跟贫下中农划等号”。所谓“城市文明”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而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的。知青给农村带去城市生活的文明，在这种状态下实非易事。

假如所谓的“城市文明”能够对当地农民生活发生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只能是文明最表层的东西，例如早晨刷牙，晚上洗脚，以及一些较为新鲜的衣服样式等等。然而随着生活的困窘和艰难岁月的消蚀，就连知青自身也都陆续放弃了这些被认为“文明”的生活习惯。

这一点在留守知青的生活现状中无一例外地得到了证实。在返城大潮过后，有极少数知青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回城。40年后今天的他们，城市青年学生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所谓“城市文明”被当地的文化彻底同化。不是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而是知青走向了野蛮。

七. 谁是受害者？

生产建设兵团是上山下乡的一个组成部分。

1970年10月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领导小组写给中央的《关于生产建设兵团会议的报告（摘要）》是这样阐述建设兵团性质的：

“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战时一面作战，一面坚持生产。”

兵团知青的生存境况作为知识青年生活的聚集地，从一定程度上更为集中地表现了知识青年的特征。

纵观全国各个兵团的历史，都有一个从初期的纪律严明，意气风发，转变为理想破灭、人心涣散，颓废堕落，直至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解读这个由盛及衰过程对于理解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破产的必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大事件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所谓“奸污女知识青年”事件。此类事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是普遍发生的。一篇文章讲了这样的事情：“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十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¹

这样的事件在知青成堆的兵团更为普遍。中央政府对“奸污女知青”事件十分重视，不仅仅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也曾大开杀戒，企图杀一儆百以求禁止这种风潮。中央曾经多次派遣调查团前往事发地点调查处理此类事件。第一个派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结果以

¹《被社会忘却了的故事》<http://wenku.baidu.com/view/5bbe937201f69e31433294b8.html>（2015-12-22 检索）

第十六团的两位团级军官被判处死刑而告结束。第二个派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结果以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被枪毙而了结此案。结果不仅仅没有止住这种潮流，而且愈演愈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奸污女知识青年的人，上至兵团司令，下至师，团，连各级首长，都有所发生。内蒙古兵团四师副师长一人奸污女知青 38 人。内蒙古兵团某团共有 6 名市委常委，其中有 4 名犯有奸污女知青罪行。¹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最高首长，兵团司令何凤山也严重犯有的奸污女知识青年罪行。这个事件可被视为导致内蒙古兵团败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讨论此类事件之前首先应该把“刑事犯罪”强奸案同“权色交易”案件区分开。当然在知青下乡过程中，发生过刑事犯罪分子奸污女知青的案件。那属于刑事案件，其性质跟社会上强奸案件没有区别。因此这种案件本文不做讨论。

历来在对待“奸污女知青”事件上人们往往把指责的锋芒仅仅对准犯案的男性长官。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理上也仅仅给予案犯男方严厉的处罚。女方则作为受害者受到保护。其实，这是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的正确态度。然而对于发生在知青中的这样的案件如此不做区分一概如此处罚，却不可避免的忽略了事件的本质，进而也忽略了这个事件更深层的社会因素和人性因素。

除去刑事案件之外，说到根底所谓“奸污女知青”事件的本质是“权色交易”。而此类事件所涉及的女知青也并非全部都如同人们所理解的“无辜的受害者”。兵团战士在边疆，所面临的是恶劣的气候，闭塞的交通，常年饥饿、极度劳累等等艰难的生存环境。政治上则面临着严格的思想管制、永无休止的“改造世界观”和噩梦一样的“扎根边疆一辈子革命”的厄运。这种艰难的生存条件对于女知青就显得更加艰难。剥去“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堂皇的外衣，裸露出的是摆脱个人厄运的本能反应。摆脱厄运的途径十

¹何岚 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324-327 页。

分狭窄，只有入党、提干和上大学等为数极少的机会。然而决定这些机会给谁的权力则掌握在各级现役军人手里。至此，权力寻租的充分条件已经具备，权色交易无法避免。

摆脱厄运是每个人的需求，而机会只有极少数。推荐上大学每年不超过总人数的1%，入党提干也不会高于这个比例。在这种供需悬殊的“市场”中，“女色”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竞争的硬通货。

并非所有现役军人长官都有可能成为“权色交易”的罪犯。而是只有那些有权决定知青命运的首长才有可能染指女知青。而那些“受害者”，多数成为改变命运的受益人，绝少有例外。知青的命运对权利的依附性，是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在这样的事件中也使人看到在人性（human nature）之下，道德、操守、尊严、人格在残酷的生存条件下不堪一击。只要命运依然被权力操控，“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就不可避免。

当这种“权色交易”在知青中成为一种无法掩盖的普遍现象时，对广大知青的心理冲击是强烈的。本来入党、提干、上大学等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对于工作优异者的奖赏，虽然渺茫，但毕竟是希望，也是为数颇多的知青努力工作的动力。当这个“希望”被个别人以肉体交换的手段“截和（音“胡”）”时，努力工作就失去了动力。这是兵团最后彻底溃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到本节的起点：谁是受害者？如果我们能够彻底摒弃肉体快乐、占有欲的满足、以及摆脱厄运、出人头地等等最为世俗的价值考量，而仅以人类共同的最基本道德作为价值标准的话，此类事件的受害者恰是权色交易的双方。不管他们是否因东窗事发而受到惩罚，他们各自都伤害了自己的尊严和良知。世俗价值的获得尤恐难以修复心灵的创伤，这种耻辱在他们内心恐怕终生都难以磨灭。

固然案件双方并不是没有道德缺陷的。然而当严厉的惩处，甚至死刑都没能制止这种事件继续蔓延的时候，指责他们的道德，乃至严惩他们显然并没有找到事件发生的根源。值得指责的是产生这种事件的制度。人性本身就是那么脆弱，制度却要把人性放到严酷的环境中严加考验。人性是无法改变的，那么应该指责的，应该改变的是什么？

八. 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1973年6月22日至同年8月7日）”上转发了一封来自云南兵团的《情况反映》引起了全体与会人员的震惊：云南兵团四师某团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青年不是坚持正面教育，而是采取捆绑吊打的手段进行镇压。这个团30个单位中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之多。许多人被吊打多次。捆绑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¹

其时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²

更耸人听闻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二十团发生了由团党委发动的“两个运动”，即“红柳条运动”和“姑奶奶运动”。所谓“红柳条运动”就是组织知青用红柳条“教育”落后知青。所谓“姑奶奶运动”则是组织女战士殴打男战士，以羞辱和殴打的手段实现教育目的。在团党委的领导下“两个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团十一个连全面展开。团党委书记，政委在发动“两个运动”的报告中说：“这次运动不仅要触及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运动开展时期，每到夜晚，二十团驻地上空回旋着一片被打人凄惨的嚎叫声。有的战士被殴打昏厥，用凉水泼醒再打。有的女战士头发被揪得黑一块白一块。也有的熬不过殴打，凌辱，和无休止的检查批判而服毒自杀。

出人意料的是，在35年后采访原内蒙古兵团二师二十团团、党委书记任德志先生时，他却说：“开展‘两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整顿部队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至于殴打落后战士，是教育方法问题。”当年他是强烈反对“两个运动”以暴力手段教育落后战士的，由他说出“两个运动”发动的正当理由和良好的动机应当是真实的，可信的。事实显示这也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那么事态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¹ 何岚 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302-311页。

² 《“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

<http://mjls.hk.cuhk.edu.hk/book.aspx?cid=6&tid=172&pid=1286>（2015-12-23 检索）

从调查得到的材料看，被打者主要犯有如下错误：

- 反党，反毛主席，反党支部，反解放军。
- 读反动或黄色书籍，唱黄色歌曲。
- 偷懒耍滑，完不成劳动定额，消极怠工。
- 小偷小摸。
- 打架斗殴。

归结起来，如上情况的发生与他们实际生活状态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首先，严酷的物质生存条件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二十团组建初期，同时面临着基建，开荒和备战三项任务。基建任务完不成，冬天到来将无处栖身；开荒和农田水利工程任务完不成，次年将无土地耕种；战备所必须的军事训练又是眼下必须做好的。团党委压力非常大，必须加大劳动量，否则无法完成如上任务。通常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此外还有政治学习。每天“天天读”一小时，晚上“晚点名”或者班务会，“斗私批修”。有时“遇到问题不过夜”，要通宵深挖思想根源。在劳动任务紧张时，则把政治学习改为劳动，由此更增加了体力消耗。此外，早晨有出操和军事训练。经常夜里紧急集合，军事演习。有时候一夜数次。夜里轮流站岗，白天的劳作照常进行。公休采用休“大礼拜（两个星期公休一天）”。在各种大会战中劳动则没有时间限制，经常超过16小时。长时间的体力消耗，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恢复体力。

强体力劳动，使得战士对于食物的需求量猛增。女生通常一顿也能够吃掉5、6个二两一个的窝头，而能够分到的只有2个。而按正常的供应，是早晨5两，中午6两，晚上4两。食物距离满足身体需要相差太远，他们常年处于极端饥饿状态。

每月供应定量是45斤粮食，3两食油。但是当时从粮站买到的粮食经常是发霉了的玉米面、高粱米或白薯干。由于兵团的组建，突然使得本地区食品需求量急剧增加，副食品严重供不应求。进而导致价格猛涨，造成有限的伙食费大幅贬值。

一方面有超强的体力劳动，另一放面粮食供应严重不足。饥饿和劳累成为了每个人终

日挥之不去的恶梦，全体战士处于十分痛苦的生存状态之中。

据九连军医韩士修记载，1970年底，九连女生除了少数在连部和炊事班工作的人员之外，全部闭经！她们都是16、7岁的青春少女，其受到的摧残程度可想而知。而男生的劳动量要比女生大很多，但分配食物则是相同的定量。可见男生的身体状态比女生还要糟得多。一方面竭尽全力寻找食物，另一方面尽量增加休息，减少体力消耗几乎是每个人的生理反应。

如果只是暂短的困难时期，通过政治教育渡过难关是可能的。然而二十团从建团后不久就全团陷入劳累和饥饿状态，直到1975年4月兵团转交农场，长达五年的时间始终也没有解决过度劳累和饥饿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偷懒耍滑，纪律松弛，和偷窃食物，偷杀牲畜等等行为普遍发生。依靠“狠斗私字一闪念”“努力改造世界观”的虚幻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事管制难以维持正常的连队秩序。

其次，严酷的政治生活环境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兵团实行的是部队的管理体制。“政治挂帅，思想第一”是管理兵团的首要原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行严格的思想管制。

可以读的书，除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以外只有很少的供批判用的书籍。可以唱的歌只有样板戏、语录歌和少数革命歌曲。爱情歌曲被算作“黄色歌曲”，“流氓歌曲”或“资产阶级靡靡之音”而被严格禁止的。读“反动书刊”和唱“黄色歌曲”的轻者受到批评，重者要点名批判，批斗，甚至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置。

在贫乏的精神生活状态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被制度化强制施行。“天天读”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一小时都要读极为简单枯燥“老三段”，“新三段”。与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倡导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努力改造世界观”。

当时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因此对于劳动不积极，不遵守纪律的则经常“上纲上线”。轻者批判，深挖思想根源；重者当做阶级敌人彻底批倒斗臭。

在这种极其严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态下，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相信虚妄的“造就

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等政治宣传。为数极小的摆脱这种命运的一线希望——提干，推荐上大学等也被走后门和权色交易侵占。他们看不到希望，对前途彻底丧失信心。在这种状态下要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几乎在相同的时间（1973年前后）在全国其他兵团都有类似事件发生。其性质完全一样，都是为了挽救兵团的溃败，由领导组织对兵团战士实施暴力。这种事实表明，上山下乡中兵团这种形式溃败的必然性。用暴力手段企图挽救它的溃败是徒劳无功的。

此事件另一层面的问题是：没有疑问这是典型的“权力犯罪”事件，跟法西斯犯罪有着相同的性质。无论出自多么“美好”“善良”的目的，暴力本身已经犯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和道义的谴责。

“捆绑吊打知青”并没能挽救兵团的败落，而是相反，仍以二十团为例，“两个运动”撕破了“革命大家庭官兵互爱”这层虚伪的面纱，使得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的关系陷入对立状态。不久，二十团就彻底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现役军人的任何号令都无人执行，各种生产活动完全停止，全体战士为所欲为。

上山下乡的这种形式——兵团，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

九. 被遗忘的小白鼠

上山下乡运动是以大约 99%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表明彻底破产。

尽管在上山下乡初期就有知青想尽一切办法回城，然而大约直到 1978 年知青回城才达到高潮。此时，当年下乡时平均年龄只有 16、17 岁的少年，已经长成 26、27 岁青年。老高三已经超过 30 岁。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要靠父母资助。不管兵团还是插队，他们的生存状态已经十分悲惨。云南兵团知青成为当时全国知青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

“统计数字表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¹

在这种状态下，颓废、潦倒甚至堕落的风气像瘟疫一样在知青之间蔓延。下乡前“培养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的政治谎言早已经没有人相信。理想破灭，信念丧失，前途渺茫是他们共同的内心伤痛。他们没有财产，没有谋生能力，没有知识，没有荣誉，没有责任，没有希望，没有尊严。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有无法融入乡村，他们是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无业游民。不管是兵团还是插队，知青的群体堕落是触目惊心的。

偷鸡摸狗，偷盗成性。乘车不打票，住店不交钱，无视法纪，欺压当地农民，许多乡村的鸡给知青偷光，达到“百里无鸡鸣”境地，农民见他们犹如见到土匪。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疚感。这是全国知青的普遍状态。

毛主席要试图通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实现他们道德上的完善。假设毛泽东对他自己的理论是真诚的，那么，当这一理论付诸实施的时候，实质上是，他启动了一场改造人性的实验。那么1600万知青就是他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毛泽东早在1972年就允诺他们“统筹解决”，然而直到他撒手人寰也没有见到他有解决知青问题的任何举动。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对这场实验的进展、结果毫不关心，他似乎忘记了他曾经启动过这么一场实验。知青成为了被毛泽东遗忘了的小白鼠，未来命运由他们自生自灭。

¹ 邓贤：《中国知青梦》，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页数待查）。

上山下乡的初衷是要培养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其结果却培养了一支庞大的流氓无产者的队伍。他们不仅没有实现道德完善，反而在道德上滑向深渊。

笔者相信，假如知青没有游行，请愿，上访，绝食等一系列示威活动，即便他们的处境再艰难，政府也绝不会让他们回城。

回城成为潮流起始于 1975 年中央政府的如下决定。

这一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兵团现役军人撤回原所属部队，兵团交归自治区农垦局管理，兵团改为农场，兵团战士改为农场职工，知识青年一律改为农工待遇；

6 月 5 日，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安徽兵团；

6 月 24 日，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内蒙古兵团；

7 月 16 日，全国 11 个兵团，2 个生产师的现役军人全部撤回原部队，全国所有兵团全部交归地方农业部门管理，全国所有兵团战士一律改为农场职工，接受农工待遇。至此，建设兵团从中国大地上消失，兵团战士这种特殊的身份也随之消失。

对于全体兵团知青而言，他们普遍感到的是被愚弄，被抛弃，被欺骗。本来是隶属于解放军系列，突然变成了农垦系列，在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名誉上有着天壤之别；现役军人说走就走，把他们丢在了边疆，他们感到了知青身份的卑微渺小；本来是知识青年，有着“接受再教育”的使命。哪怕是自欺其人，冥冥之中仿佛回到城市，回到家乡还有着一丝希望，现在成为了农工，这种希望彻底破灭。接下来的终生命运就是种地务农。这和他们的理想，或者同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期待岂止有天壤之别！多年来挥之不去的“扎根边疆”的噩梦突然间变成了现实。他们真切地看到了执政者的恶劣的机谋：他们在使用操作技巧偷换知青的身份。使用权谋把他们丢弃在边疆，由他们自生自灭。选择逃离理所当然。

知青的回城运动是触目惊心的。全国各兵团几乎都有规模不一的示威请愿游行。规模最为宏大的是云南兵团。他们举行了万人的罢工、进京上访；数千人的绝食等请愿活动。请愿中他们用血书表明他们的决心：“不回家，毋宁死！”。最后他们以割腕、三万知

青长跪痛哭迫使中共中央答应了他们集体回城的请求。¹就知青当时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态讲，这样的反抗随时都有可能在全国任何一个知青聚集地的方发生。从这样的情形笔者看到，全体知青回城已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然而执政者向他们敞开回城的路只有一条：病退。

知青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病。有病，也必须是不适合在农村生活的重病。为了搞到一张重病诊断证明书，他们不惜花大价钱买通医生，开出诊断证明。内蒙古兵团二师医院就有兵团战士人人尽知的标价：一只羊或者一袋白面在医生那里换一张诊断证明。更多的人是造假病。有的为了弄出高血压，吞食大量的麻黄素，达到血压 180/100，心率 130/分钟，长期如此弄假成真，许多人真的患上高血压。有的为了制造肾炎大量吞食食盐，时间久了真的得了肾炎。无数造病的方法在知青中广泛流传着，多数都有导致重症的危险。为了回城命都豁出去了。

也并非有病的就都能回城，其中一个条件：必须未婚。于是，已经结了婚的知青为了回城纷纷离婚。在西双版纳农场发生过五天内 3,000 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事件。²只要能够回城，什么事都肯干。为了回城，抛弃本地人的配偶已经是普遍行为，凡与当地结婚的几乎没有例外。知青在最困难的时候当地配偶接受了他（她）们，一旦知青有了回城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抛弃当地配偶，自己并没有任何良心的谴责。

为了消灭已婚的痕迹，或者为了回城后减少累赘，把自己亲生的孩子送人的，丢弃车站的，抛弃荒野的，早已不是偶然事件。人类在巨大灾难，诸如战争，饥荒，瘟疫当中都不曾发生过的此类事情，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普遍发生着。知青的堕落不仅仅失去了道德底线，也不仅仅失去了基本的人伦底线，连动物本能的底线也失去了。

当时的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知青回城的处理上是缺少基本同情心和人道关怀的。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一点。当时的下乡政策已经松动。“病退”回城已经是众

¹ 邓贤《中国知青梦》，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页数待查）。

² 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 <http://www.cnd.org/cr/ZK00/zk210.hz8.html>（2015-12-23 检索）

人皆知的谎言，它的实质就是允许知青回城。但政府为什么一定要逼迫知青撒谎，造假，行贿，使他们身体蒙受摧残，让他们抛妻（夫）弃子，心灵蒙受耻辱和创伤才允许他们以病号的身份灰溜溜回城呢？！

政府有能力下一道“安民告示”允许知青以正当的理由分批回城，然后给他们分期补习基础文化或劳动技术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些，知青后来的处境也会好得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导致知青堕落的最终原因，或许并不是他们经受的苦难，而是他们的被欺骗。他们是受害者，他们也是被骗者，他们是被欺骗而受害的。他们清楚地看到从他们下乡开始直到回城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谎言，胁迫和计谋。欺骗者就是以精神领袖自居的毛泽东和各级政府。这是他们道德底线崩溃的最终原因。

法国知青史研究者潘鸣啸认为：“1970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运动是最近开始发展的维权运动的先驱”。¹这样的评价颇有拔高之嫌。

所谓“维权运动”一般被认为是“维护人权”的运动。《维基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维权运动”的：“维权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和反抗权利不被侵犯”的运动。

就史实讲，上山下乡运动是政府侵犯了知青的自由权利。因此知青作为人权的被侵犯者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归还他们应该有的权利，从这一点上说“回城运动”是具有“维权”意味的。然而在整个“回城运动”过程中知青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拿起法律作为武器，提出归还人身自由的诉求。这表明知青在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在维护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因此说回城运动是“维权运动”的先驱颇为勉强。

当进一步思考“回城运动”的价值时会发现，它很难获得较高的价值肯定。

在“回城运动”中，知青们既没有提出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了政府侵犯理由，也没有提出“归还应有自由权利”的诉求。在社会最底层生活了10年之后，他们没有代表整个底

¹ 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引起的争议》《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层农民去争取平等的权利，而是只为恢复自己“城市户籍”的身份而抗争和甚至是乞求。这个运动所涉及的充其量只是知青自身的等级归属问题，而没有冲击到等级制度本身。这个运动只是生存层面的诉求，而没有升华到精神层面，真理层面的追求。也正因如此，一俟生存诉求得到满足，随即欢天喜地，甚至感激涕零。

令人遗憾的是，不仅仅在“回城运动”中，在整个知青运动中，甚至所有知青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见到表达知青与农民平等的思想，见到的只是他们的特权思想和对特权思想的肯定和赞扬。究其原因，如前所述，由于教育与世界文明相脱节，使得知青一代不具备世界文明的视野，使得“回城运动”只能在生存层面上展开。因此这个运动也不可能在法律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留下任何标志着历史进步的痕迹。

十. 回城后的处境

回城后的知青在改革开放中的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充分的事实证明，这种结果是由教育缺失所造成的。

下乡知青总人数是 1647 万。他们当中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或大专班的、以及历年上过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的总数加在一起大约有 115 万人，且不管这些人实际接受的教育质量如何，只以形式论，他们最终受过高等教育。另外还有 50 万人在文革中被推荐读过中专和中技学校，这些人加在一起总共 165 万人。其余 1482 万人都只是文革前所受到教育水平。¹

如前所述，在这 1482 万回城的知青中，上过高中的“老三届”因为他们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在知青回城后的“就业潮”和十年后的“下岗潮”中尽管他们年龄较大，反而显示了他们较强的竞争能力。然而“老三届”高中生在总共有 13 届的知青中所占比例很小。

1979 年 3 月政府开始招工文化考核、择优录取。各大城市的考试结果显示 99%的回城

¹ 参见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5 期。

知青考不及格。这不仅仅决定了他们就业的艰难，而且决定了他们今后所从事的工作只能是简单劳动或者体力劳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政府开始的“顶替政策”确实是解决返城知青就业问题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多数回城知青通过顶替得到了安置。回城知青的平均年龄大约 26 岁。此时他们父母的平均年龄大约 50 岁。这就是说这些知青的父母为自己的子女在漂泊十年后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他们不得不出让自己的工作机会，提前 5 至 10 年退休。文化革命所造成的劳动力过剩的危机，很大一部分是最终通过“顶替”平安地转移给了知青的父母而得到化解。

接踵而至的是 1990 年代的“下岗潮”。

1996 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 750 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 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 56.8% 年龄在 35 至 45 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¹

下岗后的知青再就业问题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在体力劳动方面，他们的竞争对手是潮水一样的农民工。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知青在年龄上、劳动力成本上，显然都不具有竞争优势。在脑力劳动方面，知青的竞争对手是大批的刚刚毕业的高中生，中专生和大学生，知青既没有知识和技术，年纪又大，显然也没有优势。这些现实使得知青群体沦落全国各个大城市生活最为贫困的群体。

同样因为教育的缺失和下乡岁月的耽搁，使得知青在社会生活上处于被边缘化境地。他们既没有能力参与改革，也没有能力享受改革的成果。他们没有话语权，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话语能力。

十一. 结语

¹ 参见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5 期。

如果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里来观察，上山下乡运动是反文明运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有一个明显的，清晰可见的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趋向，而上山下乡运动则是要一代青年走向野蛮。其结果也恰恰使一代人走向了堕落。

如果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到人性立场去考量，上山下乡运动是反人性的运动。人性中本来就有追求文明，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愿望，而上山下乡运动则剥夺了一代青年追求文明、幸福和自由的权利。

如果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在法律层面去考量，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次政府违法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 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公民有“受教育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条款。但以毛泽东为首的各级政府发动，并强力推行了上山下乡运动却达十多年之久。

上山下乡运动给民族带来的灾难至今依然难以估量，却难以发现有正面的影响。

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¹

然而当我们把知青作为群体来考察时会发现，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造就知青群体特殊的正面的精神素质。在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以后，艰难的生活和超强度的劳作充其量只能增强他们吃苦耐劳的能力。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苦难绝不是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源泉，甚至相反，只能束缚它们的产生。

自由思想的出现，首先依赖于自由思想的来源。在知青接受教育的年代，中国的教育跟世界文明进程相隔绝，同时对世界文明进行着全面的否定和抵制。在知青下乡的年代，他们的全部思想来源是被阉割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两报一刊”的宣传和以“八个样板戏”为代表的文艺作品。这就切断了自由思想的来源。

¹ 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引起的争议》，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自由思想的出现，其次依赖于“不以思想获罪”的法律保障。且不说知青下乡的年代，即便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一点也远远没有做到。

再次是自由思想的产生还依赖于，不因追随统治者意识形态而受惠和不因异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而受害的社会生存环境。这一点同样不仅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也远远没有做到。在这样封闭的、偏狭的、被扭曲的社会体系中产生自由思想是难以想象的。切莫说教育缺失，下乡十年的知青群体，即便是通晓科学，谙熟文史的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在现存体制下业已出现普遍的、深度的犬儒化，对自由思想的互相戕灭、自我阉割已经是他们普遍的自觉行为。知青群体产生自由思想岂非痴人说梦？

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社会学界这一代人难以产生重大成果，则是上山下乡运动给民族造成的另一个重大灾难。不仅仅是因为耽搁了岁月读书太少底气不足。致命的是多年把伪马列作为唯一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灌输彻底摧毁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思想能力。

知青历史研究者倪乐雄认为：“历史上人们无非采取两种立足点不同的生命实践形式，一是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二是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当代东方的知青运动和西欧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就其本质而言都属于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运动。揭去各自东西方文化之外衣，两者具有极其相似的特征。”¹

当我们考察知青运动全部过程的细节时便会发现知青运动距离“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运动”相去甚远。知青运动从它的被发动以至于最后政府被迫允许回城，包括发动者政府和受害者知青，从始至终只在生存层面挣扎。只有毛泽东的“再教育”说，颇有“精神”层面的意味。然而究竟毛泽东对他的说法有几分虔诚尚且值得探讨。对于知青群体而言，究竟有多少人怀有“十字军东征”时宗教式的虔诚走到乡下去的？作为特殊个体，这种人或许存在。但用这样的虔诚描述一个群体，一场运动则是荒唐的，有失于书生的卖弄。把上山下乡运动当作“精神层面”的远征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并且没有任何史学价值。

¹ 倪乐雄：《知青——“东方的十字军”》<http://www.yifan.net/novels/zatan/zqdfszy522.html>（2015-12-24 检索）

回到本文的起始。回顾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对民族灵魂的一次窥伺。包括领袖、官员和百姓。所见无一不令人失望，令人无奈。

笔者无法证明这个种族比其他种族更好，或者更坏。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乃至文革中的表现让人看到的全民族的猥琐，狡诈，凶残，苟且和人格分裂，却很难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找到相同的例证。我们暂且假设这就是人性，是全人类共有的、固有的习性，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假设相同的条件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身上他们都会如此表现，那也并不够成宽恕自己的理由。正因如此中国人就更应该做点什么，好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令人失望的是直到4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些罪孽有过严肃的忏悔和认真反思。

一部短短的知青历史，不过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全息缩影。今天，灵魂没有改变，文化基因没有改变，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相似的事情不再度发生呢？当然，未来再发生一模一样的文革，一模一样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没有可能。然而未来发生的任何社会灾难，其内在逻辑一定跟文革，跟上山下乡一模一样。■

11/5/2008 1:23:50 AM 初稿完。17069字 20页

11/12/2008 7:43:06 PM 第一次修改完 17450字 20页

11/15/2008 2:17:18 AM 第二次修改完 19138字 21页

12/25/2015 1:49:20 PM 为《记忆》修改完 23556字 29页

【专稿】

知青维权

——漫漫回京路

马昌海

在1978年以前，北京知青返城，很多是采用“病退”和“困退”的途径。要想通过这种方式回城，首先要家庭出身好，根红苗正，血统纯正；其次是要取得当地乡村干部的同意或批准。如果是知青的家里有权有势，那就另当别论了。多数招工、招兵、招生无望，“走后门”无路，没有机会离开农村的知青们，就想方设法利用“病退、困退”的方式回城。建设兵团的知青属于全民所有制职工，在人员流动上受到比插队知青更严格的限制，“病退、困退”就成为其返城的主要途径。许多人为此不惜孤注一掷，久而久之，假冒现象愈演愈烈。尤其假冒重病的手段，花样推陈出新，骗术无奇不有，其目的均在于获得一纸有病的医院证明。有许多手段都是以残害身体为代价的，如服用麻黄素、升压灵造成“高血压”（会造成吐血和昏迷），喝1%的高效麻醉剂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有的知青为了早日挤入病退的行列，不惜滥用灰黄霉素，打肾上腺素、冬眠灵等药物，甚至往血管里注射柴油，完全不计及后果。为了回城，建设兵团、农场、乡村的各级干部、医生，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有关单位的人事部门都成了知青及其家长们的“公关”目标，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关热”悄然兴起，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¹许多已经在当地就业和上学的知青，也纷纷要求辞职、退学，回农村恢复知青身份，以期回到父母身边。

1978——1979年，在云南、新疆等地成千上万的知青请愿、罢工甚至绝食，要求返城

¹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310-312页。

的强烈呼声惊动中央并得到谅解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知青返城浪潮席卷了神州大地。¹

1980年代初，当知青返城的大幕落下之后，在祖国的天南海北，仍然散落着成千上万在文革期间“自愿”离开北京的前“知青”，他们因已在当地就业而失去了“知青”的身份，不准许再迁回他们生长的城市，不能回到亲人身边工作。

于是，那些留在当地的、估计有十几万的原北京知青，就陆陆续续踏上了艰难漫长的回京之路。

“对调”是当年这些人回北京采用的一种常见方式。那时北京满大街的电线杆子、公共汽车站牌、临街公厕墙壁上也像现在一样贴满了小广告，但内容与现今大不相同，没有什么“刻章”、“收药”、“开发票”、“一针见效”之类的，最常见的就是“对调”，格式很简单：

北京 对调 某地	当年在北京的一些企业，如首钢、北京市的几个
性别：×	建筑公司等，都有一些外省籍工人，有的是复员军人。
年龄：××	如原国家建委一局，就有不少从基建工程兵成建制集
工种：××××	体转业的工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的妻儿都在原籍，
在何地何单位工作	不可能来京定居。建筑行业的工作环境差，经常在天
欲调往何地何单位（或何类单位）	南海北的穷乡僻壤从事艰苦的野外作业，一年到头也
联系人及电话：	难以回家照顾老人和妻儿。即便是未婚的前农村兵，
	也不大容易找到愿意嫁给他们的北京城里姑娘。于是，
	他们就希望在家乡找个国有企业的工作，哪怕离家近

点也好。而原北京知青也愿意借这样的“对调”方式取得北京户口，哪怕是以此为跳板，此后再设法调走也可以。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当然，这些外省籍工人愿意通过“对调”方式回原籍，也不是无条件的，最好是当地企业能够安排其妻做临时工。实在解决不

¹ 邓贤：《中国知青梦》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页数待查）；曲博、罗小文：《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中国国际实业家出版社 2006.5（页数待查）；刘晓航：《我要回家》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页数待查）。

了的，也要给一些金钱和物质补偿。从开始是一辆自行车，到后来水涨船高，开出的“价码”也越来越高，从800元现金以致数千元不等（当时北京一个二级工的月工资也就是四五十元左右）。有的人刁钻奸猾，同时与两三个想回京的“对调”对象建立联系，哪个“对调”对象的综合条件最好（如企业所在的地区位置、工种、待遇或开出的“价码”最高），他就最终与之成交。所以有的人陆续找了两三个“对调”对象才最终办成的事情，也时有所闻。

一、返城大潮后原北京知青的第一次集体维权：出师不利

回故乡北京工作与家人团聚是何等艰难。山西原平县的三个原北京老高中的知青、时任中学教师陈景远、王莹和时任原平县肉联厂厂长尚岩在看到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后认为：彻底否定文革，就应该否定文革中的“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否定文革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定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回故乡北京工作就有了希望，要利用这个机遇解决返京问题。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有背景的知青早回去了，我们的年龄不小了，孩子快大了，再不奋斗就没有出路了。当前只有把我们的观点变为知青们的共识，向北京市反映大家的愿望，让政府理解同情才有成功的希望。这当然是很难的事情，北京是首都，又是大城市，人口不能增长太快，而且还要考虑全国的连锁反应。但我们是文革中被迫中断学业下来的，是文革的受害者，不管有多难也要奋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只可能走向工联主义。必须由先进知识分子从外部进行灌输，工人阶级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¹ 必须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² 因此，主张由工人农民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理论难以自

¹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366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4-245页。

圆其说，且有反智的民粹主义之嫌。

在静静的原平县城，老知青们聚集在一所中学开了第一次讨论会。提出“否定文革、否定‘再教育’，坚决要求返回北京”的行动口号，决定了两件事情：

- 1、起草致北京市及各级领导的公开信，表明愿望，提出要求。
- 2、派代表到北京上访，经费由老知青们自愿集资。

这两项决定，拉开了山西原北京知青要求返乡维权活动的序幕。这封 2500 多字的公开信明确指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文革的产物，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要想全面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则，对文革的否定就只能是部分的、不彻底的。”信中还说：“文革以来北京人口增加了几百万，帐算不到我们头上。数以万计的铁道兵复转人员能在北京上户，难道北京就再容不下我们区区故乡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付出的牺牲，他们坎坷的经历、不平的待遇、历尽艰辛的磨难与错划右派、文革中老干部的遭遇相差无几。”信中又说：“小平同志一贯提倡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五七干校问题、遣返人员问题、右派摘帽、建设兵团知青返城、四类分子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不都顺利解决了吗？我们认为该是为我们彻底落实政策的时候了。”251 名原平县北京老知青在信上签名，打印了 200 多份，于 1984 年 10 月发往北京市委、市政府、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各新闻媒体和一些知名人士。12 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了信的部分内容。有人把信的内容张贴在北京东单的报栏橱窗上，引来众人围观。

原平县知青的公开信伴随着秋风迅速传到了山西各地的北京老知青手中，离原平最近的忻州知青与原平知青一起组成了上访代表团赴京，走访了北京市、国务院、国家劳动部信访部门。北京市信访处的人员表示：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否定“再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蹊跷的问题，要尽快反映。而其他部门都拒绝予以回答，“再教育”问题令其始料不及而为难。

临汾市是山西全省原北京知青人数最多的地区。初冬的寒风中，500 多老知青汇集在

临汾钢铁公司的灯光球场，宣读了给北京市的公开信，选出了赴京上访代表。而北京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答复是：你们已经在当地就业，现在已不是知青了。但他们却对“再教育”的提法应该如何否定都不肯作答。北京市信访办的一个年轻接待员说：这是胡闹，文革遗风！而后，原平、忻州、代县、繁峙、定襄等地老知青代表第二次进京上访，临汾地区老知青还向北京发出第二封公开信，几天内近千封信发往了北京，但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期间，《山西日报》发表评论，严厉斥责忻州、原平地区老知青的作法是采用文革串联形式搞上访，是文革遗风。一些老知青愤而开始酝酿大规模的行动。晋中介休铁路中学的一位原北京知青向《人民日报》反映了这些情况。198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特刊第七期刊登了其来稿《山西的北京知青正集资拟进京上访》：这个活动由忻州地区的知青开始，每人捐款一元，作为派代表去北京上访的经费。临汾、侯马、闻喜、运城等地知青也纷纷集资准备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他们认为，这代人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上山下乡都被他们赶上了。如今他们没学历、工资低、父母在千里之外不能经常照顾。他们都已结婚有了孩子，子女教育问题也不好解决。为此，他们在山西工作不安心，一心想回京。国家严格控制北京户口的增长，只能搞对调，但对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主要是金钱交易。对调一个北京户口，对方要价三、四千元，这对一个月薪只有五、六十元的人来说，实在太难办了，就是这样的对调对象也极难寻觅。他们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一、凡是文革时期从北京出来的知青户口应允许转回。二、工作问题，本着专业、工种对口由政府妥善安排，不一定非在市区，可否在郊区或郊区卫星城安排。三、如工作暂不好安排，可否允许先将户口转回北京。

从1984年秋天到1985年春天，山西各地的原北京知青在要求返京回乡的旗帜下，结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太行山麓、汾河两岸，凡有北京老知青的地方都有了联络网，产生了一些组织维权活动的领军人物。这些人基本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冒着被单位乃至有关部门监视、斥责甚至处分开除的危险，为了老知青的正当权益而孜孜不倦地奋斗。但知青们的不断上访均未结果，解决问题无限期拖延，终于引发了一起影响中外的北京市委

门前静坐请愿事件。

1985年4月，山西的原北京知青由过去的分地区上访开始转变为全省联合上访。4月15日，来自忻州、原平、临汾等地的二百来名老知青集合到北京市信访处，继续询问他们以往多次上访提出的返京问题解决结果。市信访办主任分两批接见20余名知青代表。在激烈的对话中，忻州地区的一名知青代表把“再教育”与“上山下乡”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了批驳：“再教育”的说法否认了我们文革前受到的良好思想文化教育，说我们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黑苗子，强行驱赶尚未完成学业的、不到就业年龄的中学生去农村从事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残青年，践踏人权，不否定就不得人心！插队知青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要求返京是正当权利；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有大规模的、不分情况的“上山下乡”，我们中学生也不至于被中断学业驱出北京。反右时期，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迫到外地改造，现在不是都落实政策回京了？难道我们被迫接受“再教育”就不应该落实政策吗？信访办主任回答说目前北京没有知青回京政策，你们的问题无法解决。老知青们见对话仍旧没有结果，就有组织地从信访办到市政府西门聚众请愿，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接见，但当天并没有得到答复。

4月16日清晨，老知青们又成群结队来到市政府西门外，表示见不到市领导不罢休，有些人还到市府东门静坐。下午两点，一名副市长同意接见知青代表。忻州、原平、临汾、定襄等地的知青代表进入了市府。副市长封明为和市劳动局长、信访办人员在座，这是老知青们多次上访以来接见规格最高的一次。老知青代表又一次申述观点：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给知青落实政策。封明为副市长强调老知青全部返京有困难。代表们提出：文革中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有10.8万人，如今只剩1.5万，如政府有困难，可否分几步解决，一是先解决户口进京；二是解决不了户口能否先让知青在京长住或先解决知青子女的户口；三是动员复转在京而家在外地的原基建工程兵、铁道兵人员与知青对调；四是将知青家长户口与知青对调。副市长答复说：目前只有三种情况的知青可以办理回京：一、两地分居，一方在京的；二、大龄未婚的；三、双方均是北京

知青的丧偶者。并表示北京将组成调查团赴山西。

封明为副市长的答复使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原北京知青中这“三种人”问题的解决，在以往也是非常艰难的。但这“三种人”在原知青中很少，满足不了大多数老知青的要求。下一步如何办？有人主张回山西等待调查团，有人提出：调查团不知何时去山西，应趁热打铁在北京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静坐请愿活动。这种意见符合当时大部分老知青的想法和激愤的情绪，一场静坐请愿的准备开始了。



从4月16日到4月21日的五天里，很多电话、电报从北京打回了山西，有人由京返晋发动组织，准备参加静坐请愿的老知青们也纷纷到京。4月21日，知青维权活动的组织者在中山公园碰头，部署了次日的请愿方案：我们的行动只是要表达回京的迫切心情，达到回京的目标，不掺杂任何政治目的。静坐时要有

（上图：知青静坐请愿）秩序，避免坏人介入；出现情况不要乱，有专人解决；不许与外国记者交谈；一切行动由各地区负责人安排；就餐、饮水统一从集资款中解决。

4月22日晨，500多老知青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市信访办门前，其中有很多是近几天从山西的原平、忻州、定襄、太原、长治、吕梁、介休、榆次、临汾、侯马、运城等地赶来的。上午9时，参加静坐的人员四人一排，列队来到北京市委正门，在楼前台阶依次坐定，要求市领导接见。这些人30多岁，神态平和，衣着朴素。在队伍的前面打着横幅：“彻底否定文革，落实知青政策”。有几位知青从提包中取出宽80公分，长十几米的横幅标语。准备悬挂在市委大楼阶梯两旁高大的灯柱上。此时从队伍中冲上来四个和知青年龄相仿的人，一边抢夺标语一边高喊着：不许挂！不许挂！知青们立刻围上去质问：你们是哪里的混蛋！？赶紧滚！那几个人不敢再抢夺标语，灰溜溜的走了。于是，有人提议老知青们严格按照不同的地区分开坐，结果一些混入队伍身份不明的人又被清除了。

这些经过文革风暴和多年底层生活磨砺的老知青经验丰富，将这次维权活动组织的有

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大家只是静静地坐着。组织者在事先就宣布了纪律：不造声势，不呼喊口号。其目的简单明确：要求实际问题，不做任何对解决问题不利的事情。绝不去激怒政府，不给政府以任何压制请愿的机会和借口。

如此阵势使市委的工作人员开始感到了震惊，他们抬来了饮水桶提供开水。静坐开始后，不断有陕西、内蒙古、东北的原北京知青陆续加入，静坐队伍不断扩大。过往的行人、市民和中外记者迅速将此事传遍了四面八方。

将近中午12点，市信访处人员传达了市委指示：选出几名代表，市长准备接见。代表晋北、晋中、晋南老知青的九名代表由市信访办主任带着来到了市委三楼会议室，在座的还是上次接见知青代表的副市长封明为，市劳动局长和信访处处长。知青代表再次阐述了“再教育”理论的荒谬，列举了文革式上山下乡运动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指出了知青们所遭受的不合理待遇，论证了要求回京的合理合法性。而副市长及在座的官员们却尽量回避理论上、政治上的问题，对话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激烈。有知青代表激动地说：“有门路的知青全回京了，没有一个高干子弟还留在山西。山西好，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哪儿？回北京还算好的，往国外跑的也大有人在！”官员们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一位官员厉声斥责：“你们还想和×××（刘少奇、邓小平都有儿子曾在山西插队）的儿子比？！谁让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呢！”。这句话使知青代表们哗然和气愤，对话无法再进行下去，只得不欢而散。代表们回来后向静坐的知青们做了传达，“谁让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的”话引起了极大的反感，激发了大家继续请愿的决心和意志。

4月23日清晨8点，北京市委大楼门前又坐满了老知青，（下图：知青请愿）一些知青家长也加入了静坐队伍。市委大楼正面挂出了大幅标语“六八年北京赴山西知青坚决要求返回故乡”，两侧挂出了横幅：“知识青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和“六八年的插队是文革的直接产物”。围观聚集的人很多，堵塞了交通，中外记者来了一堆，摄影、录像忙个不



停。老知青们向国内记者表明观点递送材料，但拒绝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与馈赠：这是我们与政府之间的事情，与外国人无关，请走开！但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读卖新闻》、《泰晤士报》、香港电台等 20 多家境外新闻机构仍连续报道了这次静坐请愿事件。

静坐继续，到了 4 月 25 日，开水供应停止了。烦躁、绝望的情绪开始产生，再加上骄阳暴晒，大风狂吹，老知青们所在的山西省各单位派人进京动员返晋，静坐人数由高峰时的 700 人下降至 300 人。就在此时，闻讯赶来的山西侯马、运城、忻州等地的 100 多老知青加入了静坐请愿的行列。

4 月 29 日了，知青们已在北京市委门前静坐 8 天，“五一”劳动节临近。下午 4 时传来消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接见全体静坐知青。几百名知青列队走进市委第二会议室，市委书记、市长、两位副市长、市劳动局长全都在座。四周警卫林立，戒备森严，气氛异常严肃。市委书记李锡铭首先讲话：你们这次集体静坐是非常错误的、是违法的，干扰了市委、市政府的正常工作；阻碍了交通；给国家声誉带来不良影响；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市长陈希同接着讲：你们好多事做出了圈，跳得很欢，闹得很起劲的，警告个别的一、二、三，不要走得太远，“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要立即回山西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

情势急转直下，市委领导的接见和讲话犹如当头一棒，给静坐请愿的老知青们以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大家只得灰溜溜地返回了山西。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山西日报》纷纷报道：北京市委妥善处理了一起静坐请愿事件。央视的报道在结束时强调：绝不能助长“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良社会风气。

山西各地在公安部门的参与下，对组织知青维权活动的领头人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各单位采取了轮番谈话、令其交待检查等手段对他们进行审查。北京方面还调回部分知青代表的档案调查其有无后台。此后这些老知青代表人物一直是山西、北京有关部门密切注意的对象，直到 5 年后知青问题的全部解决。

在随后5月21日的五省二市工作会议上，就此次知青静坐请愿问题，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能马上解决的要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给解释清楚，答应以后解决，群众会同情达理的。现在我们应转变一下思想，群众闹事，不要首先考虑有没有阶级敌人捣乱，这个思想方法要转变过来。遇到闹事问题，首先应研究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有哪些失策的地方？闹事的也不一定是想推翻共产党，或想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想把帝国主义拉进来。总书记胡耀邦插话：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山西的一个北京知青，说下次来京就准备豁出去了。这个问题要注意啊！有没有该回来的没回来，不该回来的反而回来了，或者走后门回来的情况？要把工作做在出事之前。¹

4月16日北京副市长讲话略微松口的消息传来，散布在祖国天南海北的原北京知青中符合回京条件的“三种人”奔走相告。不符合条件的某些人也纷纷想方设法，开出了假未婚证明甚至假死亡证明，以图浑水摸鱼，蒙混过关。这种情况被发现以后，在相关的调动表格上，必须盖单位公章、单位办公室、单位人事部门等三个公章，并由三个盖章人亲笔签名之后，方能有效。有的老知青为达到目的，通过办理离婚成为“三种人”以便返京。甚至个别地区原北京知青中有将近半数的人办了离婚证，北京方面弄不清真假，只得又规定只有1985年前的离婚证才有效。离婚、复婚在某些地区的老知青中竟然一时成了风气。

我的一位北京八十中的同班同学，文革初全家被赶回了河北易县老家，父母亲先后故去。为了回北京，他与妻子商定，瞒着岳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儿女判给男方。他带着儿女回北京落下户籍后，与妻子复婚。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以这种方式回京者就不下数人。

此次经市人事局办理回京手续者大概不下万人，经市劳动局办理回京手续者据说也有数万人。

二、第二次维权活动：继续集体请愿加“柔性”申诉，达到了部分目的。

¹ 陈兵：《山西原北京知青返京问题解决纪实》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10年7月。

第一次维权请愿出师不利后，那些未能如愿回京的众多老知青并未灰心气馁，而是锲而不舍、不屈不挠地继续努力，再次投入了一场坚韧不拔、旷日持久的抗争。

原北京知青集体静坐请愿结束后，1985年6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做出了解决原北京知青困难问题的六条决定：一、凡农业户口的北京知青直系亲属转为城镇户口；二、北京知青夫妻在本省两地分居的可调在一起；三、在乡镇集体企业工作的北京知青转入国营企业；四、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的北京知青转为全民身份；五、将从事危险、有毒、有害工作的北京知青调整为较好的工种；六、改善北京知青的住房条件。这六条措施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非常优惠的。单就亲属农转非来说，就是当地人梦寐以求、非常羡慕的事情，多少有亲属在农村的人为弄个城镇户口而费时费力。还有集体所有制职工转为全民身份；解决两地分居、调整工种等问题，都是当地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才能办到的事情。

但老知青的返京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首开返京维权活动先河的忻州原北京知青，在7月的每个周末都召开街心花园纳凉会，常常会有数百老知青聚集在一起讨论返京问题：北京、山西的领导给我们的维权活动定了性，使我们处于困境。但老知青提出否定“再教育”，落实政策返京并没有错。“上山下乡”造成了国家的灾难，也毁了一代人的前途。如果有领导认为“上山下乡”大方向正确，为什么不继续实行？

很快，三晋大地的原北京知青又开始行动了。晋南临汾聚集的原北京知青人数最多。7月中旬，在临汾公园召开了静坐请愿结束后的第一次知青集会，大家提出：我们明明是文革的受害者，凭什么因上访就被扣上“文革遗风”的帽子？于是，临汾知青的维权活动代表人物开始分工联络各地的知青，他们在业余时间跑遍了太行、吕梁的各个县城，做宣传、送材料。山西各地区原北京知青的信访上访活动逐渐恢复。从8月开始，忻州、临汾、长治、阳泉、榆次、太原等地区的知青代表几次赴京与北京市有关部门会谈，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设想，但都没有什么结果。为了统一协调及时交流，知青们又建立了全省京津知青返回家园活动信息交流例会制度，会议常设地点在临汾，每月由各地区派代表到会交流情况，统一部署。为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还聘请了知青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担任法律

顾问。山西全省一个沿南北同蒲铁路线，放射太行、吕梁山脉的知青网络形成，知青维权活动进入了成熟阶段。

在此期间，政府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工作。北京市下发文件允许知青子女在京借读，待遇视同北京本地学生。但老知青最根本的返京要求仍没有进展。



同时，山西临汾的 700 多名京津老知青聚集在平阳广场，在“京津知青坚决要求返回家园”、“我们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的大幅标语引导下，开始了山西京津知青史上的第一次游行。他们事先把游行日期、路线、人数上报了临汾地委，地委领导出面

（上图：知青子女参与请愿）制止 未果。一路上，老知青们挥舞着小旗、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绕着临汾城转了一圈，老知青所在单位有关领导人员、公安民警紧紧相随，但未干涉，沿途观者甚多，很快波及到全省。

1986 年元月 31 日，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山西省委办公厅、公安厅下发《关于制止北京插队知青集会、上访闹事的通知》：“公安机关对挑头闹事者，要立即澄清每个人的情况，并掌握整理他们的材料。根据当前的表现，分别情节，由党委和公安局出面，找他们谈话或传讯，进行警告，指出他们的错误，如果不听劝阻和警告，继续挑动闹事，请示党委予以收容审查。”

紧接着，山西省政府找了 40 来个听话的北京知青组成了“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在北京及山西各地进行巡回讲演，以抵消知青维权活动的影响。1 月 28 日，汇报团在北京中山公园演讲后，几位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并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前的做法，今后还要坚持这个大方向。市长陈希同也接见汇报团成员，称他们是山西北京知青的真正代表。汇报团的讲演反而增强了知青们的逆反心，又自行组织了一次震动京城的春节拜年活动。

1986 年春节的奇特拜年：1986 年 2 月 7 日，腊月二十九，北京笼罩在春节前的氛围中，但返京探亲的山西老知青们却因对汇报团在北京的讲演内容不满，认为汇报团代表不了知青的心声，他们要让政府倾听其真实的想法。这天上午，600 多名老知青按照事先的

布置涌到了北京市委门前，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与信访处长出面接待。一位临汾老知青代表大声说：“今天我们给北京市各位领导拜年啦！”一时掌声雷动，一条大标语迅速打起来：“68年北京下放中学生向北京市各位领导拜年。”另一位知青代表宣读了拜年信，再次要求各级领导正视历史、正视现实、尽快解决知青的返京问题。随后主持人宣布：“把拜年礼物送上来！”知青们把17个土豆、5斤小米、2斤红枣、两瓶老陈醋送上，掌声又热烈响起，信访处的人把礼物收下。知青们点燃了爆竹，一时震天动地。这是自1985年4月在市委门前静坐请愿后的又一次知青维权活动高潮。这次奇特的拜年事件再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震动：从2月7日晚到12日春节期间，组织拜年活动的老知青代表分别被东城、丰台、海淀、朝阳、门头沟公安分局拘传审问。原平县肉联厂的老知青刘旭东在东城分局拒理力争，被两个年轻的警察拳打脚踢致伤。北京市公安局接管了信访接待站，所在的街道两头戒严，公交车停驶，几百名警察和大量警车布置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信访处周围。

被各公安分局拘传的老知青代表们在春节后才被释放，其中被打的刘旭东上书全国人大、中纪委、公安部、北京市委，要求对抓人、打人事件做出处理，否则将予起诉。1986年3月，原平县北京知青结队游行到县政府，数百封山西北京知青的“状告信”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随后，北京东城公安分局政委、纪检书记赴原平县当面向刘旭东赔礼道歉，并出示了对随意打人的两名警察拘留15天的处理副本和审讯记录。

“万民折”的诞生：1986年3月，春节返京探亲的老知青基本返晋。与此同时，在京演讲的“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也回师返晋，分成若干组，在山西各地巡回讲演。凡是汇报团所到之处，知青维权活动就形成高潮，一边是汇报团讲演，一边是老知青集会游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汇报团成员的讲演说服不了老知青，而知青们却在不断地进行反驳。在临汾，汇报团的讲演受到更大的抵制，知青们集会并散发了宣传资料。在一份宣传材料中写道：请问汇报团的同志，当你被突然哄抬起来接受殊荣的时候，你是否更多地想到文革给祖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当你慷慨激昂发表演讲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在充当混淆是非的工具？文章同时尖锐指出：如果当前搞“好儿女志在四方”理想教育的话，首先接受教

育的应该是一些领导同志及其子女们，他们还有几个子女留在异地、边疆？他们有什么资格在滥用特权之后对历尽磨难的平民子弟指责、说教？



老知青们编辑的《知青简报》开始出刊，上面刊登了山西各地知青维权活动的消息和批驳文章：文革中上山下乡的要害是“再教育”，老知青们要否定的就是“再教育”及其连带的文革式“上山下乡”。一位知青在《“再教育”的历史回顾》一文中说：有关“再教育”理论的具体阐述是1968年5日《人民日报》的有关编者按与9月12日《红旗》杂志的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其评论员文章中说：过去知识分子是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工农兵给她们以“再教育”。由此看来，“再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完全是文革的产物，彻底否定文革，怎能不否定“再教育”呢？

另一篇题为《剖析“再教育”》的文章说：“再教育”否定了建国17年来千百万青年，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受到过良好思想教育。文革前，广大中学生在党的阳光抚育下成长，出现了众多英雄模范人物，根本不是“再教育”理论的阐述者所说的那样，都成了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另外，“再教育”理论把人类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都说成是反动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要接受“再教育”。连初一、初二的学生也不放过，只有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思想，这是历史的倒退。“再教育”摧残了一代人，是20世纪的一场大悲剧。针对北京有领导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前就有的，今后还要坚持这个大方向。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文革前确有少数人上山下乡，但基本上是自愿的，国家并不需要所有学生毕业后都去当农民；而文革中的“再教育”是迫使绝大部分中学生都去插队

当农民。把这两种不同的下乡混为一谈，实际上就是用文革前的下乡掩盖文革中错误的“再教育”，不能自圆其说，更不能以理服人。

这些文章把“再教育”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起到了统一知青思想的重要作用，更坚定了人们为返京回乡而奋斗的决心和意志。

1986年4月13日，山西忻州500多老知青举行集会，宣读了《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对纠正文革以前和文革中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处理错的历史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是，如何看待文革中的老三届中学生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想法和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1968年的所谓‘再教育’运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在彻底否定‘十七年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前提下，以不正当手段把北京的几十万老三届中学生‘一刀切’地赶到农村，与当年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一样，去接受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运动实际上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产物。”“在党中央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我们至今仍留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向党和政府提出落实政策，返回故乡的要求，当然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文革中的‘再教育运动’与文革前实行的上山下乡，无论从形式、内容和性质，我们认为都是有原则区别的”，“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18年来在山西的大部分知青明返城、暗返城都可以被默认和理解，东北军垦建设兵团神话般地一夜之间几十万人大返城，也被史诗般地再现于中央电视台屏幕。而我们现留在山西的知青仅仅是因为提了一个返城回故乡的要求，就受到斥责和警告，甚至被公安部门跟踪盯梢，通知传唤，收容审查，个别知青还遭到看守人员的殴打侮辱？”“请党和政府相信您的儿女，我们这一代人懂得：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坚信党的领导，一切历史遗留问题会在正确的政策面前迎刃而解。”这里没有过激的言语，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知青的赞同。

山西忻州老知青们同时发起了针对这封公开信的全省万人签名（又称“万民折”）活

动。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从太行到吕梁，从汾河两岸到晋北高原，凡有老知青的地方就有签名活动的进行。各地区的老知青代表人物不辞辛苦，走家串户征求签名，本着自愿原则绝不勉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征集到老知青签名 6900 余人，制作了有 80 多页的“万民折”。“万民折”复印了 50 份，由 36 名老知青分成 6 个小组进京递交给国家最高机关和新闻媒体。

国务院和北京市信访部门接到“万民折”后答复：“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许集体上访，万人签名是不安定因素；有困难找当地政府。知青代表进行了批驳：1、我们反对的只是 68 年“再教育”式的上山下乡；2、不能说知青活动是少数人闹事，文革期间到山西的大部分知青已返京，为什么剩余少数人一提返京就是闹事？3、只有反对极左路线，解决历史遗案，才能铲除不安定因素；4、既然上山下乡正确，那现在为什么不再发动一次？5、我们提供原在山西插队的，现已返京的 200 多个高干子女名单，让他们再返回山西，哪怕当县长、县委书记的，我们就不再提返京的事。国务院和信访部门均无法作答。

1986 年 6 月 14 日，《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群众来信摘编》再次刊登了 1985 年 4 月 9 日《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上反映过知青返京要求的介休铁路中学那位知青的来信；还刊载了老知青们春节在北京市委门前聚众拜年，在山西各地举行集会游行，抵制“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讲演，搞万人签名活动等情况，《群众来信摘编》并谈到：老知青们对文革期间“六八式”插队的正确性表示怀疑，认为这与文革前少数人的自愿上山下乡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按“六八式”插队一代代下去，那就是摧残青年，践踏知识，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文章还说，老知青们的要求与愿望如不能圆满解决，平息这个风波是困难的。这是国家级内部刊物再次登载山西知青的情况，而且还列为头条。

1986 年 7 月 21 日下午，山西各地知青代表再次上访，北京市信访办主任赵祐在接见他们时表示，目前对于知青返京问题还没有新的精神。

千余老知青省城游行：转眼到了 1986 年 10 月，山西各地京津老知青纷纷举行纪念粉碎“四人帮”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街头打出标语，召开集会，继续控诉极左路线，彻底

否定“再教育”。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桩报复知青维权活动代表人物的事情。春节期间曾被东城公安分局拘押的忻州钨丝厂职工杨存突然被免职，下放车间劳动。原平县北京知青步行40公里到忻州参加由数百人参加的忻州市北京知青游行。老知青们向省、地有关领导及各地知青发出函电，披露事实真相，反对压制、报复知青维权代表人物的行为。其所在单位忻州钨丝厂只好又重新任命该知青为三产企业副经理。这一情况进一步激发了老知青们的情绪，他们觉得如果不让有关领导知道知青们的决心和意志，问题的解决可能还要不知拖多久，报复和打击还会有。于是知青们拟召集全省原北京知青骨干到省城举行一次游行，以显示老知青们的力量和决心。（下图：山西知青在太原的请愿队伍）



1986年10月26日，太原的清晨冷风飕飕。上午9时，太原火车站一下聚集了近千名老知青，他们是来自大同、榆次、临汾、运城、长治、忻州、原平等全省各地区的京津老知青代表，都是连夜乘车赶来。组织分散在多山的晋省各地知青统一时间来省城行动，在当时通讯、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的条件下，需要有周密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老知青们在坚决返乡的旗帜下做到了统一行动。经过简单的布置，9时15分，由八名老知青组成前导队，近千人排成四列纵队由车站广场出发，经五一广场、迎泽大街、解放路向省委所在地进发。八幅大标语穿插在队列之中，主要内容有：京津知青坚决要求返回家园；请求党中央对文革中的“再教育”问题给予明确答复；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对知青进行迫害；大人物与小百姓在政治上应人人平等。老知青们挥舞着小旗振臂高呼，沿途围观者不下十万。游行队伍

通过路口时，四个红灯同时开启，各种车辆全都停驶。一个太原的老交警说：自打太原解放以来，路口四个红灯一起开启的事从没有过。中午12点，游行队伍到达山西省委门前，一位老知青代表宣读了致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并递交给省委办公厅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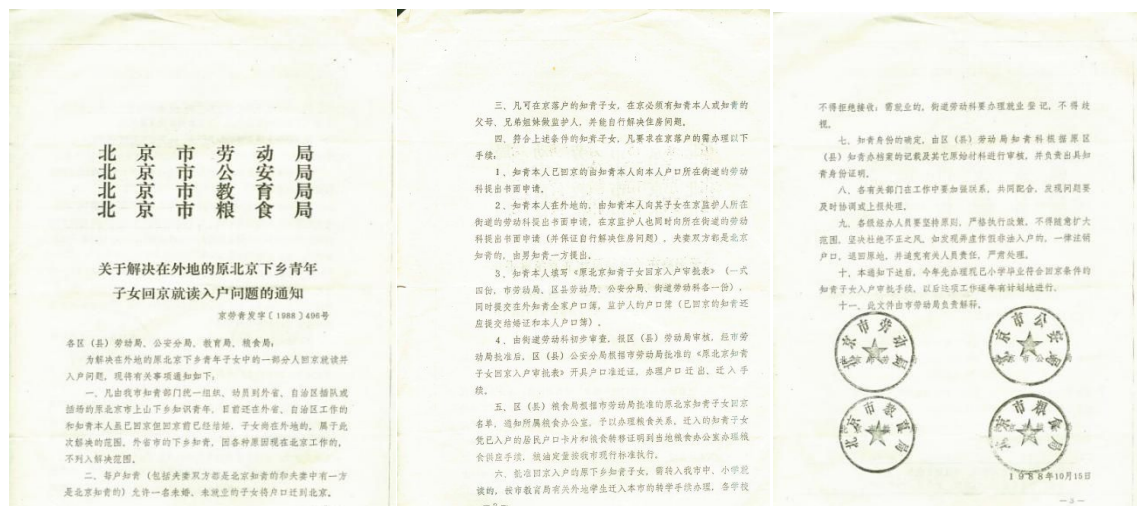
就在山西原北京知青维权活动呈逐渐升级的态势之时，1986年12月4日，北京发生了大学生学潮游行示威的事件，同时，北京市游行示威管理条例也即将实行。下一步的知青维权活动应如何进行，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正确的分析。一个寒冷的冬日，9名知青维权活动的核心人物在山西忻州研究了下一步的部署。有的人主张：“八五年在北京市委搞了静坐，八六年在北京市委搞了拜年，八七年春节快到了，干脆在北京搞次知青游行，何况有了上次太原游行的经验，可以给知青维权活动造成更大的声势”，也有的人反对：“目前形势复杂，大学生在北京刚游行完，游行示威管理条例已开始实施，我们搞游行有违法的嫌疑。”双方争论激烈。最后表决的结果，以5：4的微弱多数否决了在京搞游行之举。会后，各地区老知青同时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及北京市委发出电报：山西的原北京知青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事后，公安部的内参也提到：知青在忻州玻璃厂某知青家以5：4的微弱多数取消了北京游行。

1987年春节，北京市信访处终于松了口气，虽有大批山西知青返京探亲，却没发生大事。2月2日，22名老知青代表再次到北京市信访处，信访处领导出面接待：你们今年没游行，出乎意料，这样很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老知青代表们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十六字方针：允许回京，鼓励留下，统筹兼顾，综合治理。由此看来，老知青们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活动，遵守法律、掌握政策、把握火候，因势利导取得了一些效果。

连续数年的春节后，一些老知青们陆陆续续再次结伴来到北京市信访部门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我们已经把青春献给了三晋大地和陕北高原，对当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对此我们无怨无悔。但现在我们的子女都渐渐长大了，当地学校的条件较差，教学质量令人堪忧，这成了我们最大的心病。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到北京来接受比较好的中小学教育？

老知青们的申诉摒弃了集体请愿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柔性”策略：“轮流值班”。

也就是每天组织二三十人，日复一日轮班去申诉，以造成一种人多势众的印象，形成一种潜在的压力：因为工作人员每天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不让官方看出有计划、有组织的迹象。于是，有关部门的走廊上，每天都站满了黑压压的一排人，谦恭有礼、不吵不闹地默默等候：你们忙，我们不影响你们的日常工作，你们何时有空，我们就何时与你们谈。这种状况持续了多日，所有的人都是提出了同一个请求：希望解决子女在京入学的问题。



知青们连续申诉的结果是：1988年10月15日，北京市劳动局、公安局、教育局、粮食局发出《关于解决在外地的原北京下乡青年子女回京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京劳青发字[1988]496号），规定每户知青允许一名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将户口迁入北京，办理转学或就业手续。

三、顺应1989年后的形势，老知青们达到了其全部目的

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知青们仍然在默默地等待时机。进入19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顺应1989年“六·四”之后“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老知青们再次采用“柔性”策略提出了申诉：我们的孩子回京上学已经数年，祖辈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无力照看渐渐长大的孙辈。我们因此牵肠挂肚、日夜寝食不安，能否恩准我们回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众多老知青们连续不断、日复一日祈求申诉的结果，就是北京市有关部门终于默认：凡是自

己能够找到工作接受单位的，可以准许回京。凡地质、煤炭和环卫部门，可以优先安排接纳。夫妻一方不是原北京知青的，也可一同户口迁京。结果，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大约5万原北京老知青闻讯照此办理了回京手续。

从1984年至1989年，在5年的岁月里，一个从社会底层自发产生的念想，最后能够得到圆满解决，这里包含了历史的机遇、合理的奋争、决策的实际、实事求是的体现等综合因素，表现了国家有关政策在文革后的务实态度。这是继北大荒、云南知青返城之后又一个知青梦的实现。北大荒、云南知青的返城梦，是知青们在兵团农场集体就业，相互紧密联系，而且大部分知青还没组成家庭的情况下实现的；而这些山西原北京知青的返城梦，是在当地分配了工作并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的情况下实现的，解决起来的难度就大得多。

这些老知青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女且已离京20余年，很多人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接受单位，于是，一股不大不小的“假接受”浪潮，蔓延了京城数年。所谓“假接受”，就是先找一家接受单位，通过各种关系，结识该单位劳资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以后，双方约定：先由这家单位出面接受，办理相关的调动手续。等调回北京落实户籍以后，再慢慢寻找合适的单位调离。由于这是私下里的口头约定，这其中就难免会发生形形色色的曲折和故事。这些故事，最好能由当事人来细细述说。最麻烦的结果是，有的当事人如愿调回北京之后，竟然长期找不到真的接受单位，甚至长达一两年。而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就是所谓“假接受”单位不折不扣的职工。于是有的人在走投无路之下，就“讹”上了这个单位，要求正式予以安排工作，搞得双方都进退两难。

很多老知青都是1968年离京，再回到北京工作时已是1990年代初了。

2006年夏天，已回京工作十几年的一些山西原知青维权活动的代表人物，邀请原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聚餐，感谢他当年在知青返京问题的解决中所做的大量工作。袁先生20年前主持解决知青问题时46岁，他说这辈子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市委秘书长任上，解决山西的北京知青返城是我一生难忘的得意之笔。当时我心里很同情你们，很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有亲戚与你们的遭遇一样，但我又不能明确表达出来，觉得非常难受。我真不希

望你们当时继续大闹下去，那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你们后来还是挺聪明的，没有趁学潮时再闹事，问题也解决了。后来在接受《凤凰卫视》鲁豫的采访时，当年主持经办处理知青回城的袁立本也感慨地说：我感动在哪呢，我觉得，仅就“有分寸地”把握事态发展这一点，我们反而始终是“被动”。他们甚至比我们一般领导干部还高明，甚至还聪明。

袁立本说，当时很难，怕波及全国，又要解决问题，他采取的办法是取得市委领导支持，有关部门配合后默默进行，除解决知青子女进京户口发了一个文件外，再没发过什么正式文件，但问题也彻底解决了。“从来没上报中央任何文字材料，都是我顶着。”时任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是支持的，同情知青，所以事情最终办成了。袁立本谈了当时北京市委的想法：知青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正因为一定要解决，所以对他们有些过激的做法，我们心里就更着急甚至有时生气，可又不能言明。但是再怎么着急，我们再怎么生气，他们做法再过分，我们心里有个底限，这个底限就是你再怎么闹也惹不火我，你闹也不会让我急着办这事儿。出发点就两条，第一要把孩子们都弄回北京来；第二条得顾全大局，这对于我是雷打不动的。难点在于，第一，知青回城没有中央的正式文件，如果北京知青可以回来，那么上海，天津的知青都要回来，国家一下承受不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带来一定的不安定。当时的社会背景无论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讲，我现在还认为不容许那样；第二个难点，回来以后得吃饭，得养家糊口，工作怎么安排？第三，北京市也不能发文件，也不好发文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行动的政策，难点就在这里。¹

这注定是命运多舛的一代，他们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形势和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漫漫回城路上旷日持久的努力，也显示出这一代人在生活的挤压和磨砺之下，在夹缝之中善于捕捉时机、策略运用娴熟以及其性格中顽强韧性的一面。这的确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附录：

¹ 陈兵：《山西原北京知青返京问题解决纪实》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2010 年 7 月。

北京市劳动局、公安局、教育局、粮食局《关于解决在外地的原北京下乡青年子女回京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京劳青发字[1988]496号） 1988年10月15日

各区（县）劳动局、公安分局、教育局、粮食局：

为解决在外地的原北京下乡青年子女中的一部分人回京就读并入户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由我市知青部门统一组织、动员到外省、自治区插队或插场的原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目前还在外省、自治区工作的和知青本人虽已回京但回京前已经结婚，子女尚在外地的，属于此次解决的范围。外省市的下乡知青，因各种原因现在北京工作的，不列入解决范围。

二、每户知青（包括夫妻双方都是北京知青的和夫妻中有一方是北京知青的）允许一名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将户口迁到北京。

三、凡可在京落户的知青子女，在京必须有知青本人或知青的父母、兄弟姐妹做监护人，并能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四、符合上述条件的知青子女，凡要求在京落户的需办理以下手续：

1. 知青本人已回京的由知青本人向本人户口所在街道的劳动科提出书面申请。

2. 知青本人在外地的，由知青本人向其子女在京监护人所在街道的劳动科提出书面申请，在京监护人也同时向所在街道的劳动科提出书面申请（并保证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夫妻双方都是北京知青的，由男知青一方提出。

3. 知青本人填写《原北京知青子女回京入户审批表》（一式四份，市劳动局、区县劳动局、公安分局、街道劳动科各一份），同时提交在外知青全家户口薄，监护人的户口薄（已回京的知青还应提交结婚证和本人户口薄）。

4. 由街道劳动科初步审查，报区（县）劳动局审核，经市劳动局批准后，区（县）公安分局根据市劳动局批准的《原北京知青子女回京入户审批表》开具户口准迁证，办理户口迁出、迁入手续。

五、区（县）粮食局根据市劳动局批准的原北京知青子女回京名单，通知所属粮食办公室。予以办理粮食关系。迁入的知青子女凭已入户的居民户口卡片和粮食转移证明到当地粮食办公室办理粮食供应手续，粮油定量按我市现行标准执行。

六、批准回京入户的原下乡知青子女，需转入我市中、小学就读的，按市教育局有关外地学生迁入本市的转学手续办理，各学校不得拒绝接收；需就业的，街道劳动科要办理就业登记，不得歧视。

七、知青身份的确定，由区（县）劳动局知青科根据原区（县）知青办档案的记载及其它原始材料进行审核，并负责出具知青身份证明。

八、各有关部门在工作中要加强联系，共同配合，发现问题要及时协调或上报处理。

九、各级经办人员要坚持原则，严格执行政策，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坚决杜绝不正之风。如发现弄虚作假非法入户的，一律注销户口，退回原地，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严肃处理。

十、本通知下达后，今年先办理已小学毕业符合回京条件的知青子女入户审批手续。以后这项工作逐年有计划地进行。

十一、此文件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各位同学好友：能否将你回京的经历写出来发给我？我在搜集这方面的史料。多谢！

邮箱：mch1950@126.com 电话：13522463926 马昌海■

【评论】

失实的艺术**——电视剧《知青》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知青描写****慰 祖**

自1980年延续了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非常多，但在很多方面与生活不符，甚至背离史实。这些问题在45集的《知青》（张新建执导，梁晓声编剧，山东影视集团2012年首播）和48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吴子牛执导，马少骅主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央视联合制作）两剧中表现得尤其严重。

一、《知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电视剧《知青》的第一集，一开始就是知青们冒着大雨从闷罐车里跳下来大喊大叫：“北大荒，我们来了！”当年有几个知青是坐着闷罐车到北大荒的？我们当年是半夜到公社的，早上醒来看到公社那两排破旧凄凉的土坯房，一个女生不禁嚎啕大哭。大家一个个都沉默不语，没有兴奋的。有一批知青1969年刚到北大荒时赶上国庆节，全团知青集体收听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实况转播。上午10点钟，当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时，数百名北京知青一起放声大哭。

《知青》始终昂扬着知青们初到农村时的激情及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在常年累月艰苦劳作的煎熬下尚不得温饱而带来的前途无望，思想沉沦、精神苦闷只字未提。

我们应该从群体的基本状况出发，理性地去看待知青在这场运动中的真正苦难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能剥离历史的背景和千百万个孩子被高层和集体的意志奴役了近20年的实

际情况！更不能违背客观的残酷事实，抹杀人性应该给予尊重的前提。知青的苦难并非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脆弱，而是超出我们权利范围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只有这样的反思和内省，才能起到对今天社会的补救和医治作用。试图以集体主义精神，以所谓的人性温暖，以做我们曾经那样的好人来标榜，是十分可笑的。想以此来解除人们目前的某种绝望心理，实际上起到的只是延缓和阻碍知识和思想进步的作用。

当下社会中存在的金钱至上，权力腐败，诚信缺失等等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文革中播下的恶果。《知青》让年轻的一代对剧中兄弟姐妹般的知青友谊产生了一种向往，苦难都冲淡在那些浓浓的所谓与“农民的抱团温暖中。”并且把专制对人性的践踏，对青春的摧残和毁灭归结为个人的不幸，而没有明确指出社会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倒退。

在今天来看，知青的苦难除了个人的自我发展受阻，还产生了生存状态和竞争的不公平性，引发了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尤其是对法律的藐视，人人自危而不敢说真话。

2、电视剧《知青》写了黑龙江、陕北、内蒙古及山东知青的生活片段。其中有关内蒙古草原知青的描绘离现实生活太远了：下了马随手一扔也不栓，人靠近其右侧时马也不躲？建设兵团的女知青敢集体在野外洗澡？这种“伤风败俗”之举不会在当地蒙古族老乡中引起轩然大波？有的河里尽是牲畜的排泄物，又黑又臭，能洗澡吗？内蒙古建设兵团的汉族女知青居然还是传奇般的摔跤能手，敢把小伙子塞上嘴捆绑吊起来，最后还成了恋人？草原上的马会自己跑回临时游牧点的家而不回马群？

汉族女知青策马救“小地包”的细节，更是远离了生活的真实：在草原上，马鞭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装饰品，人们在策马奔驰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用马鞭（如果是遇上连打都不跑的“肉”马，不断用鞭子抽也不管事）。通常，骑手只要嘴里轻轻发出一声“秋”，或脚跟轻轻一磕，甚至只须稍微抖动一下缰绳，快马就会飞奔起来。只有大车老板子才会挥舞着长鞭不停地喊“驾”（车老板驾驭马车的四种口令之一），而骑手们是从来不喊“驾”的。当那个女知青不停地挥鞭上前，再用手抓住拖着“小地包”的奔马时，她手里的马鞭竟然神奇般地消失了。也不知道她是抓住了光马的什么部位，居然能够迫使奔马停下来？

然后，这个野蛮女友竟然丢下脖子上还留有套马杆的那匹马，就纵马扬长而去了？

两个黑龙江知青到草原数日，是如何神奇般地学会了驯服烈马？这两个人只是临时去买马，是从哪里弄来的蒙古袍子穿上了？他们穿的那种夹袍子一件要用36尺棉布，在那个年代，他们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布票？

在草原上也有插队和建设兵团的根本区别，生活状态迥然不同。如一年四季的饮用水问题；几年都不能洗个热水澡，浑身都是虱子。冬天在蒙古包里睡觉须戴着棉帽，醒来只见被口的白霜。一年四季做饭只有盐、牛羊肉和小米、面粉，没有葱姜蒜、辣椒、胡椒、桂皮、花椒大料，酱油醋等任何一种调料。因为根本没有卖的，从家带来的很快就用光了。更没有一点蔬菜水果，连一点咸菜都是稀罕之物。燃料主要靠辛辛苦苦地漫山遍野找干牛粪储存起来，夏季大雨瓢泼，冬季白雪覆盖，到哪里去找干牛粪。夏季到处是成群的苍蝇；冬季在旷野零下30℃的呼啸寒风中解手……想打个电话都要奔波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家里的来信也常常要一两个月才能收到。

南方山乡和水网地带及亚热带丛林知青的生活状态及劳动环境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叶辛的《蹉跎岁月》，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陈凯歌的《青春祭》，孔捷生的《大林莽》以及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作品，对此都有过一些描绘。

在电视剧《知青》中，不熟悉知青的演员表演也有点夸张失真，经常没头没脑大喊大叫的，可能会让年轻人误以为当年的人都是这样神经兮兮的；服装也过于整洁华丽，经常穿帮出错。有些对白也脱离现实明显超前了：比如居然敢在1969年公开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才到北大荒一年多，就能认识到齐勇弟弟的死是“一场历史的悲剧了”？七连的指导员在1969年也能觉悟到这是“派性害死人了”？

3、像《知青》剧中那个陕北小山村的知青们，主动放弃回城、参军、上大学的机会，坚守在农村和农民一起艰苦奋斗，根本不具备普遍性。如果让观众误认为在那个年代通过知青与农民的努力，就可以根本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那岂不成了对文革岁月的美化？

文革中各地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过程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潜规则，还出过“白卷

英雄”张铁生。有些人虽然被基层群众高票推荐过，结果却被别人顶了。电视剧《知青》的描述显然没有反映出“推荐”上大学这一过程的全貌。

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对知青大返城描写失实

1978年底至1979年，由云南知青要求返城的风波引发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

1、缘起：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1978年10月和11月两次给邓小平写信，质疑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严重弊端，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上万知青签名声援支持。云南知青开始酝酿和谋划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1978年11月11日，橄榄坝农场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难产身亡，结果演变成了一场“知青要回城！”的请愿。上万知青组成的罢工抗议队伍涌向景洪州所在地，沿途又不断有知青加入。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很快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州政府以物质手段发动起漫山遍野的农民：“凡活捉一个知青并送交政府部门的，给予加倍的工分奖励”，于是，上万知青请愿队伍在短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

12月7日，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召开。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赴京请愿代表团”。12月9日中午，因州委的一再拖延推诿，对知青的要求不予以明确答复，“请愿筹备总组”遂发出了《罢工宣言》。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不再承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知青身份，兵团知青作为已经就业的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工人，不再属于知青回城的范围。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

2、请愿：12月19日，西双版纳知青首批请愿团的北上经费在路途中的小镇通关驿站神秘丢失，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却不得要领。丁惠民在《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一文中说：“知青在昆明也向公安部门报了案，据说当时公安部门回答：只要你们不去北京，这笔钱

以后一定会找回来还给你们的。我想，所谓公安便衣偷钱的传闻就起源于此吧。”22日和24日，首批知青请愿团在昆明火车站两次强行登车，与铁路公安人员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接着请愿团集体卧轨，致使西南大动脉瘫痪，上万旅客滞留。26日，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向知青们转达“国务院已同意云南知青派数人去北京”的指示，然后率先命令车站的戒严部队撤离。在赵凡保证不追究卧轨知青的责任后，知青们撤离了火车站。



12月23日，第二批北上请愿的知青“暗度陈仓”绕开昆明，从一个小站读书铺登上了开往成都的190次特快列车，12月27日中午辗转来到了北京，随后到天安门广场静坐。晚上7点，国家农垦总局在接到国务院知青办的电话后，将这28名知青接到了万寿路农林部招待所。28日下午，请愿团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三份致华主席、邓副主席的联名信、《告全国人民书》，版纳知青诗抄、漫画。

12月30日，国家农垦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国家劳动总局、团中央在请愿团驻地召开会议，知青代表们阐述了对《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的意见和建议，表示只要承认上访合法和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他们即电令复工。国家农垦总局经请示国务院后，同意了云南知青的复工条件。12月31日深夜，请愿团给西双版纳各农场发出《复工电报》，却遭到了很多知青的抵制。

1979年1月4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知青代表时厉声斥责，知青代表不敢据理力争，更无人反驳。下午，王震将知青代表的《请愿书》呈送邓小平。接着，王震为了

缓和一下情绪，两次邀请知青们到家里看内部放映的美国影片《巴顿将军》，被知青代表们婉拒。第三次因秘书说要转达邓小平的指示，知青们才决定前往。电影放完后王震与知青们再次谈话，谈话结束时，一个鲁莽的知青突然大喊：王震，你别走！你还没有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王震回身以拐杖杵地，生气地回答：想找别扭？你给我小心点！双方不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请愿知青代表们不辞而别，悄然返回云南。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未对这一过程做出真实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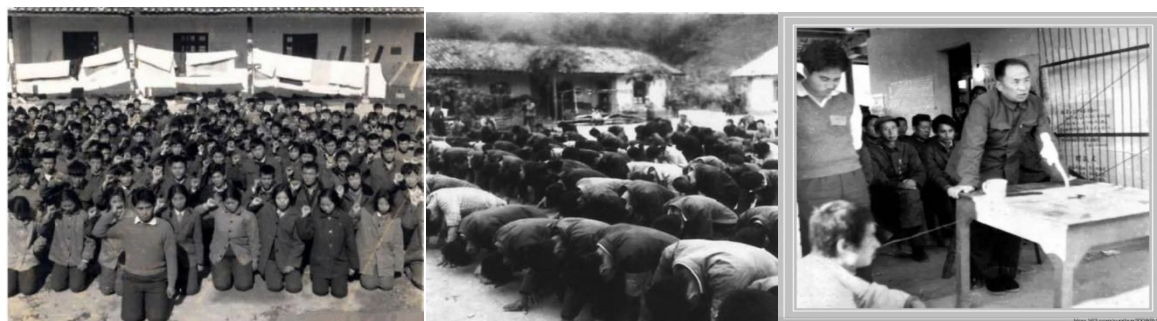
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临危受命，赴云南边疆处理知青要求返城的重大事件。赵凡从实际出发，顶着巨大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地工作，稳定了知青的情绪并多方斡旋，推动了一项重大政策的调整，促成了这一文革遗留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因而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

赵凡对这一历史场景有过详细记载：“知青闹返城是从景洪农场开始的，版纳地区8个农场有3.2万人参加罢工”。“1979年1月8日，临沧地区耿马县勐定农场告急，当时有200多人静坐绝食，一天发出2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国务院调查组前去。……我接到电话后，于当晚8时从景洪出发，连夜急驰勐定农场。从景洪到勐定的公路，跨过许多高山和大河。路况差，夜间行车确实存在危险。但为了‘救火’，也顾不了这许多。我坐车连续走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很疲劳，但总算安全到达了勐定。

1月10日下午4点，我来到农场门前招待所的广场上，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据有关人士说，大约1500人。正要安排我讲话，忽然前面的一些青年跪下了，发出一片哭声，后面跟上来的人也都跪下了，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待大家镇定了以后，我作了短暂的讲话：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做工。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地把你们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给领导以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办不成。特别是在这里日夜坐着，晚上很冷，会冻出病，把身体搞坏，将来即使回

到城里，什么也干不成。希望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劝告……”。¹

赵凡深感云南知青“闹事”非一日之寒。他以超人的胆识上下斡旋，终于公正而果断地处理了他平生所遇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实践证明，知青大返城事件的正确处理，已成为高级领导干部处理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典型案例。



（左中图：1979年1月6日13时，云南省勐定农场的211名成都知青在绝食前宣誓：“不回城，毋宁死！”右图：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身后是勐定农场罢工总指挥、成都知青叶枫。赵凡右侧站立者为绝食队队长、成都知青许世辅。）

在云南知青集体要求回城之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对上山下乡运动已有过实事求是的看法和意见。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要求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予以化解。具体处理云南知青问题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及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等人敢于负责，拿出了切实解决云南知青返城问题的具体方案，进一步促进了问题的最终解决。

3、结局：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六条处理意见：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农场知青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农民，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¹ 赵凡：《忆征程》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8月，第214-215页。

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大规模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由中央权威文献部门参与制作的传记片性质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用一个鲁局长替代了赵凡。又用一名北京女知青跪地向这位鲁局长哭诉，希望回家照顾患癌症父亲的一幕，替代了云南省勐定农场成百上千的知青们以罢工、绝食抗争，在见到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后，集体下跪嚎啕大哭的场景。并回避了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吴向东以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的细节：“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随即转身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切开了手腕的动脉血管。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喷涌而出。

电视剧把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的领军人物说成是邓小平幕僚的儿子，带头要求回城的也都是北京知青。按照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的报告，当时云南农场共有知青7.5万人，其中上海3.7万人，四川3.2万人，昆明3600人，北京知青仅剩2900人。先前8385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人已离开了云南农场。

大返城风潮的发起，是成千上万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普通知青，自发地为改变命运而向中央反映自己的诉求及抗争，与邓小平幕僚的子弟没有什么关系。大返城是关乎到上千万知青命运的大事件，处理这一事件，不是邓小平一句“让娃娃们回来吧”这么简单。原上海知青周公正在《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写于“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一文中说，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新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1980年，全国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才就此寿终正寝。■

【述 往】

北大荒记忆

季超男

查 夜

迷迷糊糊之中，我被人推醒了，一个低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哎，起床起床，该你们了。”

我“腾”地坐起来，霎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赶紧穿衣服，一面就小声叫起了身边的小毛小沈小阎几个女孩，悄没声地，几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全副武装：棉裤里套上了毛裤，棉鞋棉袜里再塞上双毛袜，圆圆滚滚地站好，然后笨重地挪动着双脚，走到冰天雪地中去。轮到我们查夜了。

好像是1971年初，珍宝岛硝烟弥漫，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后，全兵团都进入了战备状态。虽然都是兵团战士，虽然离珍宝岛只有400里，但除了打野猪的几杆枪外，我们连真枪的模样都没见过。我们这生产连队的“战备”就是由青年排执行的夜间巡查。

这一夜格外宁静，风停了，没有月亮，满天星星闪烁，好像伸手就能够摘下来。不过多数人没有这个兴致，半夜睡得正酣被骤然叫醒，胃里热热的好难受，头也胀胀的，小沈她们困得滴里搭拉的，走出门半天了眼睛都没睁开。我们是今夜第三岗了，一岗4人，两小时一换，200多知青轮班来。

查夜除了看牛棚马号机库粮仓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到各家各户去巡查，以防苏修特务什么的隐藏到谁家里去。我们打着手电，从村东口路北老李家开始，一户一户查下来，直到村子大西头老宋家；再翻到后排，从西头查到东头。全连几十户人家，无论反革命还是贫下中农，无一例外。

到每家程序都是一样的：推门（家家睡觉都不插门，是货真价实的“夜不闭户”），进入堂屋兼灶房，拉门，进里屋，用手电逐一扫过炕上的男女老幼，证实没有问题，退出，带上门，奔下一家。全过程中，只有我们扑噜扑噜的脚步声，踩积雪的咯吱咯吱声，轻轻的喘气声，忍不住的咳嗽声；老职工家里很少有什么动静，有的人家连呼噜声都没有。迎接我们的，只有几声懒洋洋的狗叫，开始那些天狗咬得好凶，后来大概狗也见怪不怪了，见人来了，哼哼几声了事。

两小时到了，一遍也查完了，还是和往次一样，没什么情况。于是走向宿舍，叫起下一岗的人，赶紧倒头睡下，又困又乏，明天还得干活呢。

查了多久我忘了，怎么结束的也忘了，无非是生产任务呀，新的运动呀什么的一冲，自然让路了吧。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既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也没有遇见任何不愉快。每一家都睡得那么熟，每双眼睛都闭得紧紧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男人还是女人，东屋还是西屋，家家如此，次次如此。

说实话，刚下达查夜任务时，反帝反修的激情，抓苏修特务的刺激，烧得我们好几天就睡不好觉了。可是渐渐的，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变成例行公事了。我们只是以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认真与服从，努力完成着这个不知为什么要执行的任务。

那些青年中我算大的，那会儿都快23周岁了。可是我却从来没想过，半夜闯到别人家巡查，这有什么不妥。在我的心里，这就跟马玉涛唱的《老房东查铺》似的，和巡查军营没什么不同。我也根本没想过，夜里，每个家里，会有些什么事情：每天夜里扑噜扑噜地来这么几拨人，人家心里会有什么感受。

直到20多年后的有一天，我才突然醒过闷儿来问自己：我们每次进入老职工家，难道他们真的都是睡得那么熟吗？为什么从来没听谁说过梦话、咬过牙、起个夜什么的？为什么每一双眼睛都闭得那么紧？

于是我不禁毛骨悚然——在那些紧闭的眼皮后面，有多少灼人的眸子盯着我们，有多少戒备的心对抗着我们！怪不得当时下达这个任务时，老职工中没一个人应承，从老连长就把它推给了青年排；青年排中老职工的子女也不参加，一股脑推给了这帮傻乎乎的知青。

并没有人提出过“以谁为敌”的质问，全连恐怕也没一个人懂得什么叫“侵犯隐私权”，但是，就和古往今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样，当人的尊严一旦被伤害，人的权利一旦被侵犯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反抗，尽管有时是无声的，就如同那些紧闭的灼人的眼睛一般。

唉，那时候，我们这帮傻知青！■

“把×××揪出来！”

这个记忆一直固执地活在我意识的深处，就像要露出水面的岩头，薄薄地迫近，等着把它唤起。怎么唤起的？记得好像是近二十年前，偶然看了权延赤的《陶铸与曾志》，看到陶铸被突然“揪出来”，于是，喷薄而出，“把×××揪出来！”的记忆就一连串流水般涌出来。

1968年6月我们来到北大荒，正值兵团组建，尔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记忆中有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打三反”……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揪出来！”的喊声。

情况总是这样的：全连男女老幼聚在文化室按部就班坐好，先共同背诵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布开会，工作组领导先作讲话，然后依次发言，开头都是诸如“红旗飞，战鼓擂”，内容多是“阶级敌人心不死”之类，开着开着会，发着发着言，突然一声炸雷：“把阶级敌人×××揪出来！”顿时整个会场死一般寂静，随即就有几个人冲入人群中，拉拉拽拽揪出一个人，胳膊往后一拧，头一按，开始批判。此时口号声响成一片。

后来我看出来了，发言揪人带领喊口号的都是事先布置好的，是运动“积极分子”。那气氛，真挺有震慑力的，别说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了，就连我们这些没一点瓜葛、

被视为依靠力量的知青，坐在会场上，一听炸雷般的“把×××揪出来！”都禁不住头皮发麻，心里头真有点惊惊的；再想想，与自己无关，惊魂才渐渐定下来。

记得“牛鬼蛇神”中最先被揪出来的是贵××、李××，据说分别是日伪时期的警官、地主：后来逐步升级，揪“现行反革命”，连大人带孩子带知青接连揪了一大串。然后“牛鬼蛇神”们就被关进了劳改队。每次吃饭都能看见看守人押着这队老老小小的进来，先向毛主席像弯腰请罪，然后依次自报家门交代罪行，然后领一份饭，躲到角落里匆匆地吃，干的自然是最脏最累的活，永远是低着头，好像随时准备被揪出队列批斗，而每次开会，一定是先把他们揪来批斗一顿。

劳改队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好像都只有12岁，据说都是“喊反动口号”被揪进劳改队的。那两年小学校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层出不穷地出现喊“反动口号”、写“反动标语”的现象。那男孩的爹据说是地主，就在劳改队里，一老一少，父子同行；要说男孩因父亲被“专政”喊喊口号发泄发泄倒也还说得过去，那女孩“根红苗正”，不光她家、连同叔叔大爷村里一连串的亲戚全是贫下中农，她自己又是红小兵的什么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经常在台跳跳蹦蹦的，却也不知为什么喊了，被揪出来了。男孩有时还显得有点不大在乎破罐破摔的样子，女孩则永远是低着头，腿弯着罗圈样的跟着这队被押着的劳改队后面，据说女孩在劳改队里还差点被欺负了。每天看着俩小孩像小尾巴一样跟在劳改队后面，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那个畸形的年代，就出这种畸形的事。

“牛鬼蛇神”中还有一个是我们北京知青，还是第一批自愿来支边的，我在怀念老顾的文章中写过他，就是自恃出身好，有点调皮捣蛋，可能是牢骚怪话或者日记什么的有点出圈，结果成了“现行反革命”……

被“揪出来”的人中让我最难忘的是拖拉机手廖家昌，他老家可能在四川，复转军人。我们刚到连队时，他宰了狗烹得香香的，把我们十几个人都请到家去吃。这是我活到二十多岁唯一的一次吃狗肉，好香啊！他被揪出来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小儿子上小学二

年级，说是喊反动口号，学校追问，据说孩子说是他爸教的，于是廖家昌就被揪了出来，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关进劳改队。劳改队里免不了挨打，加上无休止的批斗、精神体力诸多折磨，据说肾脏坏了。1972年中我离开连队时，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壮汉，已然是皮包骨头，脸色青黑，一双大眼睛眈眈着，黑洞洞的好吓人。直到几十年后，一看到甚或听到人们吃狗肉，我脑子里立刻就浮现出老廖那副皮包骨头的模样、那双深眈的吓人的黑洞。听说文革后，落实政策，他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小儿子长大了，对自己瞎说害了父亲痛悔不已，异常懂事，体恤父母，勤奋刻苦读书，终于考上了外面的学校。事情终于有了好的结局，可是人一生最好的时光却永与廖家昌无缘了。

1998年回访农场在连队见到了他，想不到的是他满面红光，除了头发白了点好像和1968年我们初见到他时一样！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真对不起，当年我们批判你……”他呵呵笑着，说：“没什么，这不怪你们，都过去了！”

我见识了一个真正的北大荒人，胸怀像大荒原一样宽广坦荡的北大荒人。■

运动——“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

这题目听起来实在荒唐，可事实上就确曾有过这么回事。那是1972年春天，4、5月份吧，连里掀起了一场气势逼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名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运动”。自从1968年我们来到建设兵团，运动就没断过，“割资本主义尾巴”呀，“清理阶级队伍”呀，“一打三反”呀什么的，我们无非是跟着喊喊口号，举举胳膊而已。可这一次让我刻骨铭心，因为它特别：矛头对准的是我们知青——运动一起，就先抓了两个上海知青当典型，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然后横扫青年男女排的“资产阶级腐蚀”现象，层层动员，人人触及灵魂，不当革命的动力就是革命对象。

运动来得真猛，发展得真迅速，先党员再排、班干部再团员，中间穿插着各种骨干会，一层一层地动员、布置。开会回来的，个个脸上抑制不住的严肃与兴奋，没开会的，自然

个个心中惴惴的，拼命睁大了眼睛张开耳朵伸长鼻子，想捕捉点信息，一旦得到了要自己去开会的通知时，顿时兴奋难抑。及至指导员大会动员前，青年排多数人都已经被动员过了，所以大会一动员，青年排立刻全面开花，运动一下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人人写决心书，全连搞誓师会，“革命舆论造得浓浓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大街小巷、会场内外，连宿舍的床柱子都糊严实了。然后“大批判开路”，班、排、连，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人人都写批判稿，个个会上都发言，口诛笔伐，上纲上线，火药味浓到了极点。那俩倒霉蛋典型——一个不遵守纪律不服从领导，比如早晨竟敢不起床上工，另一个打架斗殴——别看平时又蛮又横一副谁也管不了的劲头，三下两下的批判，就乖乖地低了头，大会检查小会认罪，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

初战告捷，迅速扩大战果——横扫青年男女排的资产阶级腐蚀现象。说起来，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最大的不同恐怕就是更老实听话守纪律更正统，因为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也更封闭：我们连离最近的连队也有十来里路，没时间也没条件去串联；1971年探亲假后，我带回来全连唯一的一台收音机，短波还被焊上，电池用完了都没处去配，要不是自己订份解放军报、平时学学毛选的话，精神食粮的唯一来源就只有全连大会听指导员连长传达文件念报纸训话了。我们女孩子当然更老实更乖更守纪律也更纯洁了，我们的“资产阶级腐蚀”表现在哪里呢？指导员为此专门在动员大会上指出女排问题：女排“有人出工不出力”，扭扭捏捏，简直是“给锄把子号脉”；有些人讲吃讲穿，看看宿舍里那些糖罐子，一张嘴就是吃呀穿呀；更有些人，留恋大城市，探亲假回来，或情绪低落，或津津乐道城市的生活方式，扎根思想不牢，革命意志衰退，还有……谈情说爱！

“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这个口号，就是在那时候，不知是谁综合、发挥了指导员的话，想出来写出来贴出来喊出来的。“革资产阶级糖罐子的命”，在女排也搞得最热闹。我们先是闹闹哄哄地贴标语，自己把自己的窗户、门上、双层床铺的木柱子上都贴上红红绿绿的标语。后来，不知是谁倡的议开的头，开始还是三三两两的，后来就呼啦啦涌到连部，手里捧着、怀里抱着平时藏藏掖掖舍不得吃的小零食、白糖之类，上交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来兵团四年了，不知小灶为何物。但是这次我也沾了边：那年冬天我得了一场类似出血热的重感冒，高烧十几天不退。我的好朋友朱小莹在团宣传股工作，闻讯赶了三十多里路来看我，带给我一个糖水罐头，我把它摆在床铺上，两三个月没舍得吃。赶上这场运动，我也把它上交了。

为什么糖罐子闹得那么热闹？现在想想，大概首先这东西比较普遍，那些上海“阿拉”们，吃不惯苞米碴子窝窝头，刚来时一开饭就哭，这二年有了探亲假，她们带回点白糖之类是必然的。不过我想这只是表面原因，深一层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个“罪状”最明显但性质最轻，而其他几条呢，哪一条摊上也够你一呛！谁不愿当革命动力而去当那“对象”呢？何况那时的青年哪个不要求进步、不想入党入团得到组织信任呢？

说不太清楚那时的心境了，但那闹闹哄哄的氛围却难以在记忆中抹灭，每个人都有点咋咋呼呼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既紧张畏惧又充满了兴奋乃至亢奋的气息，很有点“咸与维新”的味道。

我从小就懂得唱“下雨泼街假积极，刮风扫地假积极，监狱里捉特务假积极！”对假积极深恶痛绝，文革中因为不肯违心很吃了些苦头。可是这一回，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自己积极举动后面的做作，自己的闹哄，咋呼。因为我心里“有鬼”。

在抓了俩破坏纪律的典型后，又抓了个谈情说爱的典型批判，作为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标志。这是个哈尔滨女孩，有21、22岁了，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整天嘻嘻哈哈地笑，又爽气又热情。她和一个天津知青在宿舍下面的砖窑里“谈情说爱”，被烧窑的看见汇报了。于是她也是大会批判小会检查，一次次认识、过关，天天痛哭流涕的。当时的具体情况，我记忆中的，就只是她站在会场前，深埋着头，念手里的那份检查，一边念，一边抹眼泪。说实在的，亏了她那男孩儿似的性格，否则……

再回头说我。那阵子，只要一听“资产阶级谈情说爱”我就心跳，看着她在台上检查，我就抬不起头来：远在千里外的故乡也有一个人，尽管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但心中那份情感，却是刻骨铭心的。虽然除了心里萌动的那份情感外，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以我

那清教徒似的道德界限，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坦然地面对这样的批判会，更张不开嘴去评判她。在我心里，真的也认为谈恋爱这种事不光彩，起码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理想不远大。所以我心虚。可是，形势咄咄逼人，我又是班长、团员、“骨干”，上头逼着我，下面看着我，又加上“探亲假归来情绪低落”、“讲究（吃）穿”，我不积极就要引火烧身，怎么办？我那跟着闹哄，咋咋呼呼地贴标语交罐头之类举动，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假积极。我一生中头一次体会到了“蒙混过关”的境界。

写在这儿我想起巴金先生《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写他文革中挨斗，蹶在台上被逼着喊“我有罪！”心里却觉得这批斗会是在演戏，那些批判的发言的又何尝不在演戏呢！？又想起林语堂先生30年代在《吾土吾民》一书中说到的中国人的幽默：“极富闹剧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国式的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质内容。能够欣赏中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种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出租葬礼仪仗用行头一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

当初看这段话时，新奇是新奇，但怎么也体会不出来。今天坐在这里写这篇小文，我突然悟到了个中真味，不禁由衷赞叹林语堂概括之精妙深刻。

运动后小莹听了挺生气：“噢，还把我辛辛苦苦带给你的罐头当资产阶级交了！”我没法解释，说也说不清楚。倒是她的话使我心里泛起了丝丝狐疑：“她怎么会这么不理解运动？不都是你们团部机关搞下来的吗？”■

【述 往】

祭北大附中知青沈因立

——他死在山西榆次

齐 人

没想到1974年3月沈因立之死竟然在北大附中赴山西下乡插队的知青中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1980年代末，原山西知青编了一本叫《往事如烟》的书（出版时书名可能改了），其中有一篇是回忆沈因立的，文中说沈因立盼着进城分配工作，但她（他）把那个招工名额顶了，要是知道结果会如此，就应该把那个名额给沈因立。

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亲历此事，虽然已过30多年，一些细节想不起来了，但难以忘却，今天如实地写出来，也算是祭奠沈因立的亡灵吧。

1974年我已26岁，按年头算已下乡插队七年了，按实际时间算整整五年多。我无颜再让已经非常艰难的家中接济，就和本村知青杨观林闯到榆次县的“第二完全小学”（包括“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小”是指一至四年级，“高小”是指五、六高年级）做代教老师，每月可得29元。和校方谈妥后，我回自己插队的庆城大队小石拐村取粮，时间大约是阳历的2月初。从榆次县城到我们那个山村90华里，粮食就是把谷子碾成小米。那时庆城大队已经有了碾米机，碾米的加工费可以用谷糠折算，我们知青又不养猪，谷糠也就常常不要或少要。在庆城大队，沈因立见到我以后，大家都很高兴。那时知青该走的走了，想回北京的就留在北京办理困退或病退，仍在石圪塔是北京知青已寥寥可数，又是春节刚过去没几天，知青在村里的就更少了。也怪，知青刚过去插队时，还要分合得来还是合不来，如今留下的知青一旦相见就像久别的亲人，故土、孤独和失落，把大家拉得很近，总之，那是一种人世间的真情。沈因立所在的寺沟村就剩下任兆琳一个知青，因为沈

因立懂电学，大队就让他来庆城，负责刚刚建起来的全大队（包括各个生产队、自然村）有线广播站。

广播站也是他的居室，门前有一条小狗，这条小狗就知道不停地叫，他给小狗取名“凯梯”，说“凯梯”没有人养，挺可怜的。

他请我留宿，我又高兴又感激。那一天的饭吃得特别长，他做了自制的蛋糕（和好玉米面，放一个鸡蛋搅匀，再放点白糖或糖精，小苏打少许，装进涂了些油的铝饭盒里用火烤），一锅和子饭（山西民间饮食：用小米加些玉米面或者高粱面煮成的粥，再加点榆树皮粉以增加粘性，起锅时放点盐和葱花）。而这次和子饭里放的是挂面，还开了一听从北京带回来的泥肠罐头。我们吃的爽，敞开心扉地谈。谈知青的命运；谈前几天春节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在首都体育馆直敲耿飆、侧击周恩来；笑谈文革伊始，红卫兵要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表演理论体系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谈了沈和他母亲、妹妹之间的不和；谈到了他的大舅，沈因立的大舅也是我父母的至交，他说大舅特幽默，总是使人感到轻松和快乐；还谈到了近日读书的心得，有数理化，有中外文学著作，有哲学和政治书籍，记得他说“没想到高中的电学那么简单”；在谈到音乐时他说，知青歌曲挺好听，还说那些批判“无标题音乐”的人难道真的对音乐不懂吗？我们也忸怩地谈到了男女和爱，他说他有一个远房表妹，气质特别好。我们谈了有五、六个小时，时而伤感，时而严肃，时而轻松，时而认真，即使安静了，也是那么从容和不迫，这样的谈话方式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虽在生活中经常碰壁，但我也懂得了，人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只要能真心相待，就像初春的花草，也像秋天北方的壮美。我后来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庄子“自然”和儒家“诚”的理念，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晚上七点多，小石拐村贫下中农要在有线广播中批林批孔。一位妮子发言时因为紧张，稿子念得嗑嗑巴巴，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念的：“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开倒车。”沈因立和我笑得什么似的，无形中也增添了一种荒诞和轻松气氛。后来我们看原稿，才晓得那妮子念串了行。

在我美滋滋地躺在暖和和的炕上时，沈因立兴致仍很高，非让我听两张唱片，那是老式的留声机和唱片，而且要我谈感想。我听了两遍，然后说，我不懂音乐，只能说说对声音的感受。沈因立说：“你听懂了，一首是莫扎特的，一首是贝多芬的。”还说这两首曲子“也给老乡放过”，老乡说“听不得”，没有俺们山西梆子好听。当时麦收后入伏前，有一段短暂的农闲。记得1969年大队请了晋中的一个文工团唱山西梆子，腔调传得很远。天黑后戏开场了，那清悦的戏声似乎是要把远处的人们吸过来，若留开了现场，那声音又像要把人拉回来。山西梆子真是挺好听的。

沈因立聪明内秀。英文不是一般地好，酷爱音乐，也爱鼓捣无线电半导体什么的，有一股子常人无法比的钻劲儿，不过按北京的土话来形容他的神态，就是有点“礼儿大”。通过这次长聊我才知道，这个因文革只上到初二、年届23岁的青年在思想，在求一个明白。

过了二十几天，我上山拿些铺的和换的，又来到庆城大队他那儿，打算再借住一宿。

就是为了确证那一天，我在2008年4月找到沈因立的生前好友耿端，根据耿端尚存的沈因立的那份遗言，沈因立自杀的时间应该是1974年3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沈因立那天见到我，只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我看着他没有任何表情眼神说：“你怎么了？那只小狗怎么没了？”他说：“没什么。大队不让我养凯梯。”

我当时回到村里，唯一能投奔的就是沈因立了。李可虽然在，但住在寨洼，太远，乘车下山也不太方便。他似乎看出我的难处，让我留了下来。那顿饭他做的是全挂面，面里放了两个鸡蛋，开了两听罐头，一听泥肠，一听咸菜。饭前对我说：“今天我有事，你不要留宿，真对不起。”

如果说二十余天前双方敞开心扉，从容不迫犹如自然，今天则是他在倾诉，也就是说他在尽情地发泄着。我清楚地记得他说了这样几件事：

他说他吃了两顿舒心的饭，一次是他二舅妈做的韭菜馅馄饨，一次是和朋友在莫斯科餐厅；吃过两顿不舒心的饭，一次是饭刚刚吃了一半，饭馆服务员就收拾，把空凳子倒摆在旁边的桌上，一次是饭快要吃完时，服务员就扫地。我油然而言，“这顿饭是舒心还是

扫兴”，他说“还可以”，停顿片刻又说“挺舒心的”。

他说“无意间做的事，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用处”。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几年前买了一个便宜的晶体管，后来攒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时就需要这种晶体管，可跑遍北京城也买不到，猛然想起曾经买过，后来终于在工具箱里把它找到了”。此时他似乎说起“继电器”三个字。他还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最好听的歌是假古兰丹姆的丈夫在屋顶上弹着琴弦唱的，还唱了一句：“戈壁滩上风沙迷漫，卷起了整个的云和雾”。

天全黑了，我起身要走。沈因立说：“我送你。”我拗不过沈因立，只得由他送行。外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想，凡是山西知青都知道什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路上我问他，“你今天有事，是不是要写信”，他说“要写一封长信”，我说“写不写你对生活的感受”，他说“要写几句”。就这样，他将我送到了寺沟口。

寺沟口相连公路，但有一条从寺沟口流出来的河水横穿过公路，行人要踩着石头来来往往。我说“别送了”，过河时忽然听到他大声说“今天的夜色真好啊！”河水在冰凌下潺潺作响，我没听清，转身问他刚才说什么，他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今天的夜色真好啊！”然后互道珍重。

我走了也就200米来吧，前面轰然一声巨响，吓得我毛骨悚然。我知道，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砖窑。砖窑那个地方在我的知青生活中是诡异的：砖窑离公路大约五米，窑口烧火处面对着公路，天黑时就像一张开的大嘴，仿佛要吞噬过往的行人，每到天黑我单独走过此处时，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见过鬼灯，灯在我们那个山村里分为神灯和鬼灯，老乡说神灯动，鬼灯不动，而我则亲见过砖窑上的鬼灯，有人说灯就是磷火，可灯的颜色和磷火的颜色真的不一样（我不是色弱更不是色盲）；本村未满20岁的后生1972年底在修公路时从桃花塔的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结果却被传得可邪了，弄得公社武装部都派人来我们那条纵深几十里的山沟里破除迷信，这其中有一则怪事就和庆城的砖窑连在了一起。

我想，此时我要退回到沈因立的住处，就意味着我已经被吓破了胆。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手中攥着一块摸起的石头走过了砖窑。后来想，那天我要是给吓了回去，兴许也

就把沈因立的初衷岔开了！

回到小石拐村，我躺在冷冰冰的炕上，心里非常凄凉。想起二十多天前在榆次县城火车站见到一位原北京 123 中的朋友，他身形憔悴，似乎风都能把他吹倒。他告诉我，他屋子的窗户没有窗纸，炕上也没有一点热气，可是他盖了三床被子，一不小心把脑袋漏在了被子外边，就病倒了。要不是老乡觉得他恹惶，给他热汤，悉心地照顾他，今天也不会在榆次见到你金大哥了。

我似睡非醒，清晨听到村子里的四儿说：“因立在广播站自杀了！”接着就是广播站的喇叭声，让李可和我赶快去庆城大队。我路过砖窑时特别注意观察，确实有几吨的泥土坍塌在了公路边，可能就是头天夜半轰然巨响的缘故。

不久，榆次县（当时榆次要改为市，县级机构搬到了长宁）公安局的人也上来了，组织了公安局代表，知青代表，庆城大队代表一行六人正式进入广播室。公安局的人说“你们先看看遗书”。

遗书放在写字台上（凡是我打上引号的，应该是原话或原词），遗书的意思基本如下，但段落可能会颠倒：

我小的时候是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世界”，如今这个“眼镜”被“打碎”了；我的选择与大队“支书王四货”“批评我”“没有一点关系”，也“与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已经把广播线路全部检查了，有两处需要派人维修，一处是“牛寨沟”，一处是 XX。可以由“李可接替我的工作”，并把所需的工具“留给李可”；

关于遗产主要是粮食和衣物，这些遗产大部分留给了他曾经插过队的“寺沟”村的老乡，而且有名有姓；

“我的死”不会引发事故，这之前我已服用了足量的“安眠药”；

最后一句字迹要比前面的字大：“永别了，我是怀着异常平静地心情走向死亡的。”

下款和日期：1974.3.3。

遗书千字左右，有一些涂改。

沈因立已经穿好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戴了一顶帽子，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按照县公安局的意见，我们把衣服脱光，他的双手腕和双脚腕都缠绕着电线，线路通过广播器材，之间串联了一个闹钟和一个后来才知道的名字“继电器”。公安局的人验尸时用了个镊子，然后说，这是电死亡的明证。李可和大队贫协主席再把衣服给因立穿好，我则在旁边帮衬。

我呆呆昏昏地走出了广播室。在广播室前面的坡上听到公社书记对一个人说：“沈因立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追问和思想的，即使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上纲上线。

我去通知了李可。接着开会。知青代表是李可和我；庆城大队代表是支书王四货和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县知青办公室是刘宪平和一位原在介休也许太谷县下乡插队的知青，这位知青长得挺帅，戴着一个鸭舌帽，说是原清华附中的学生；县公安局二人；还有两个是什么人记不得了。

首先发言的是县公安局的人，他说话不到一分钟，最后说“沈因立属自杀身亡”。说罢靠在墙上，闭上了疲倦的眼睛。

接下来是大队支书王四货。四货蹲在门口已泣不成声，他抽抽嗒嗒地说“庆城大队广播站的建设，因立出了大力”。“因立是个好娃儿，我对不起他。我没有照顾好因立，对不起毛主席派来的北京娃儿，我有罪。”在写这篇回忆时，我似乎还能隐隐听到他的哭声。

往下发言的是县知青办那位原先在介休也许是太谷县的知青。他说，沈因立为庆城大队做出了贡献，他的自杀固然令人痛惜，但是这件事也表明知青的思想是混乱的，这是个教训。要抓好知青的思想工作，也说明了把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下去是非常必要的。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沈因立不是反革命。”随着这位县知青办代表的话落，我直愣愣地说了几句：沈因立来这里插队时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体单薄又没有力气，插队已经这么多年了，在艰难的生活中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我昨天还和他长聊过，他的死可能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其它的什么事。我的理由是：二十余天前他对我

深情地提起了他有一个表妹。再往下谁说话，记不起来了。

会后大队支书王四货拉着我的手说：“启平，你不能走。”我说：“我不走，但要回榆次“第二完小”请假。”当天下午应该是坐县知青办公室的汽车下的山。第二天又乘长途汽车回到了庆城大队。那一天我住在了寨洼的李可那里。

翌日，也就是沈因立自杀的第四天，因立的二舅、因立的好友耿端和因立的表弟，还有寺沟村的任兆琳、石片村的朱仁宝、中午时分来到了庆城大队。当时我以为其中的前者是被通知上山的，其实不是。沈因立有一封信寄回了北京，信中讲了自己的归宿选择。

由庆城大队贫协主席引路，五人直奔广播室。当时的天阴沉沉的，雪花纷纷扬扬，庆城大队的乡亲们远远地看着。耿端、朱仁宝、任兆林见到沈因立的遗体痛哭失声，加上他们疲顿不堪，声音就更撕心裂肺。只有沈因立的二舅，双眼含泪，紧闭双唇，是一种无声地悲咽。那个情景让人难忘。

大家坐在一起谈因立的后事。大队贫协主席说因立的后事要快点办，又没有现成的棺材，要送到太原去火化。因立的二舅说不用去太原，远，只需架起一垛干柴把因立烧了，再找个坛子盛些遗骨，随便埋在哪儿都行。庆城大队在场的人齐声说“使不得，使不得”。因立二舅又说，我们“五·七”干校对死去的同志都是架干柴烧。庆城在场的乡亲们执意不从。

我静静地看，也在想，祖祖辈辈生息在这山沟沟里的人，怎能让一个孤魂在这片空中游荡！而且去年鬼异，弄得人人心惊胆战，更不会如此对待沈因立了。

沈因立的二舅执拗不过庆城的乡亲，同意去太原火化。

就在这时石圪塔村来了电话，说下雪难行，车开不上山，只能到石圪塔。无论如何，遗体送走要有亲人，但赶来的人真得是太累了。大队支书王四货握着我的手说：“启平，你走一遭吧。”

不管我有多少想法，数天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当时只说了一个字“行”。

天擦黑时，大家把因立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小平车上，准备从庆城拉到石圪塔。此时雪

花零星，路上不厚的白雪似在送走这段往事。随行的老乡一个20岁左右，一个30多岁，郑重告别后，我们三个人和沈因立的遗体就上路了。从庆城下山到石圪塔40里，估摸午夜12点多到了石圪塔。年龄大的乡亲对我说：“你歇歇，我瞧着因立。”我蜷缩在石圪塔饭馆的灶台上迷瞪了一觉，知道外面刮着风，扬起了雪，也知道沈因立的遗体放在堰子下避风的地方。

天亮了，从榆次或长宁开上来一辆解放牌卡车，带了一副担架，后面拉着一个拖车。司机说，尸体放在拖车里。庆城大队民兵连长别牛也连夜骑车从庆城下来了，别牛也拗不过司机。我们把遗体抬到拖车上，然后用绳子千方百计地固定好。从石圪塔下山到长宁县要走20多里颠簸不平的路，我和两位乡亲站在驾驶室后面的车斗里。车开了，沈因立的遗体在颠簸不平的落上，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就像摇煤球，就像震动中的石粒。此前我没有掉过一滴泪，现在看着这样的情景，一阵心酸，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年龄大一点的老乡说，你要是太伤心了，就别看了。

卡车到了北河流，路面就好了，一直开到了太原市。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太原，见到了两个古塔，卡车西拐东拐地到了火葬场。在把遗体从拖车上褪下来时，因用力不均，遗体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扑”的一声，就像一块生肉从高处掉在了平地上。别牛说“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我似在哭也似在笑。大家把遗体放回担架，默默地抬到了火化炉的前面。别牛对我说：“你给因立选个骨灰盒，别太贵就行。”我浏览了一下，最贵的骨灰盒百元左右，我指着一个八元的骨灰坛说：“就是它吧。”别牛说：“便宜了。”我说：“你不是让我做主吗？我们插队生的命本来就不值钱。”别牛依了。

骨灰坛的证号是否由我拿着，记不得了。但记得当年我所代课的学校放暑假时，我必须回北京到北大蔚秀园去见沈因立的母亲，北大附中的优秀英文老师胡瑞丝（1946年曾经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过美方翻译）。

胡老师一望就是悲伤过度，知道我的来意后，眼泪簌簌如雨，但毕竟是大家出身，一点儿不失态。我说，沈因立的事我自始至终都在场，在太原我拿主意给他买了一个便宜的

骨灰坛。胡老师说：“谢谢。”我又说，处理沈因立的遗产时，他舅舅把一个写字台合5元钱给了我，今天我把钱带来了。

那个写字台1979年时我重新油漆了一下，一直用到了1985年的夏天。

今天我回忆这段往事，忽然想到：沈因立那八元的骨灰坛不正是当年从山西榆次到北京火车慢车的票价吗！兴许他的灵魂乘着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早已回到了这片故土！不知道。 ■

2008年4月15日

海淀大有北里

附录：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与在天津的李可多次联系。下面是李可的回信：

我同意你把沈因立的事写出来，原原本本按客观事实，还沈的清白！我因工作较忙，时间又过去长久，有些具体的事情记不清了，但也想简要地说说我的看法和体会。

沈因立的死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背景。文革时期家庭受冲击，父亲的死对未成年的他影响是很深刻的（其父沈迺璋，1914年生，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点名批判、抄家，挂牌批斗，受尽侮辱后于1966年10月6日凌晨在家服毒自杀）。

环境的变化。从高知家庭到下乡插队，生活环境天壤之别，对身小体弱的他来说，很难担起生活的重担。

怀才不遇。沈因立很有天赋，在文学、音乐、无线电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比一般同龄人甚至比他年长的人都要高。

情感生活上的突然打击。去世前一两天接到女友的绝交信。

我认为众多原因中，最后一条是导火索，可以说支持他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只有选择离开人世。

尽管如此，我们应对他有个公正的评价：

首先，沈因立热爱生活。从他广泛的爱好，渴望知识，在逆境中苦中作乐的精神都说明了这一点。我是从他那里学会了用小米面、鸡蛋、发酵粉、糖精（插队时很难买到白糖）和油，用铝饭盒烤蛋糕的技术，这在当时插队的艰苦生活里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其次，尽管生活对他是不公的，他还是尽自己的能力，为队里做了很多的事，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大队的广播站。从采买广播设施、零件，到安装调试，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我与他一起到各村去安装大喇叭和每户农家的小喇叭，从中深深体会到他对工作的满腔热情。他对我说过他很感激大队支书，王四货把他从寺沟（他插队的村子）调出来搞广播，正好能发挥他的专长。他正是以这种报答之情，很努力很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再有，他尽管选择了离开人世，但仍惦记着工作。他在遗言中，除了说明死因与任何人无关，还交待了一些后事。其中向大队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并把很多（三个小木箱）他用自己的钱购买的无线电零件及工具都指名留给我。正是这样，在他去世后没几天，我就去了大队广播站，直到我被调到县知青办公室。每当我想到这些，心中就有无限的感慨。

时间过去长久，沈因立去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去世前后的一些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他这个人的整体印象，应该用原大队支书王四货的话来说，“因立是个好娃儿”。我们应该记住他！

在上山下乡插队四十年之际，仅以此文来祭奠他。 ■

李可 2008年4月11日

【年终小结】

年终小结

2015年本刊共刊发学术论文23篇，评论文章29篇，随笔札记29篇，访谈13篇，述往怀人37篇。全年共出版23期（总146期）。，其中包括北大、教育、电影、知青、地院、江青等专辑。此外，本刊还开辟了“要有光”专栏，刊发了著名独立制片胡杰先生的多幅版画。

本刊之宗旨是“三个面向”——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从今年起，本刊每年评一最佳研究奖，欢迎大家提名。今后本刊将秉承上述宗旨，恪守学术精神，继续为国史研究略尽绵薄。■

【2015年总目录】

《记忆》2015年总目录

【论文】

丁 东 口述历史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在“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124期/1月31日）

何 蜀 文革时期的重庆教育（126期/3月15日）

吴 迪 文革口述中的心理学——在“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127期/3月31日）

任国庆 一个重要概念的论证缺失——关于“狼奶”与“不变资本”的思考（128期/4月15日）

马昌海 地主的“剥削”与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狼奶”与地主（128期/4月15日）

附录一：农村耕地的占有率问题（马昌海）（128期 /4月15日）

附录二：地租率的问题（马昌海）（128期/4月15日）

附录三：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节录）（杨继绳）（128期/4月15日）

唐少杰 “工宣队”刍议——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例（129期/4月30日）

马昌海 唯物史观献疑（一）（130期/5月15日）

王海光 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一打三反”个案研究（131期/5月31日）

胡宗式 1966年北大关于聂元梓执行什么路线的辩论——评《北京大学纪事》（133期/6月30日）

董国强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江苏徐州个案研究（134期/6月30日）

阎长贵 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漫议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135期/7月15日）

余汝信 赵紫阳与广东文革（136期/7月31日）

余敏玲 苏联新人保尔·柯察金与典型中国化（137期/8月15日）

马昌海 唯物史观献疑（二）（137期/8月15日）

范世涛 八一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138期/8月31日）

章 铎 我所了解的孙蓬一（139期/9月15日）北大专辑五）

吴 迪 乌托邦实验：毛泽东的“新人新世界”（140期/9月30日）

启 之 组织传播：文革电影的放映（一）（141期/10月15日）

罗艺军 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141期/10月15日）

胡庄子 “忠字化运动”初探（142期/10月31日）

常 风 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和评价人物——评章铎女士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孙蓬一》
（143期/11月15日）

唐少杰 文革中军官的集体觐见——毛泽东文革初期接见解放军十万余名团职以上干部刍议（144期
/11月31日）

张业赏 从学术争议到政治批判——从山东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看文革的发动（146期/12月31日）

【评 论】

李南央 对历史尽责，为卡玛辩诬——我看王容芬的《卡玛和她的网站》一文（124期/1月31日）

董 佳 从橡皮泥到董狐笔——简论党史研究（124期/1月31日）

- 潘祛病 “红色读物”读解（一）——革命新人斗志昂：读《新来的小石柱》（126期 /3月15日）
- 辛 逸 仰望茫茫夜空，我们能知道什么？——历史客观性漫议（127期 /3月31日）
- 潘祛病 “红色读物”解读（二）——石头爷爷带路党：《向阳院的故事》（128期 /4月15日）
- 唐 燕 《小美人鱼》和我们所缺失的爱（130期 /5月15日）
- 饶瑞农 “狼奶”讨论之我见（130期 /5月15日）
- 华新民 读扬子浪《文革日记》有感（132期/6月15日）
- 胡宗式 17日还是19日？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北京大学纪事》造假又一实例（133期/6月30日）
- 余汝信 关于维特克的《江青同志》——答台湾某学者（135期/7月15日）
- 阎长贵 我看《江青同志》一书——关于余汝信对此书的评价（135期/7月15日）
- 瀑 下 《瑞典女王》：好莱坞的异数——江青崇拜的影星葛丽泰·嘉宝（135期/7月15日）
- 船六七 《红舞鞋》的诱惑——江青最常看的电影（135期/7月15日）
-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 《江青同志》与“引文学”（135期/7月15日）
- 王海光 答客问：谈谈文革高层人物的研究（136期/7月31日）
- 朱特 狼、“狼奶”及其它（137期/8月15日）
- 潘祛病 “红色读物”解读——“高玉宝现象”简论（一）（137期/8月15日）
- 莽东鸿 战犯刘峙妻弟黄兆楠的右派档案（138期/8月31日）
- 杜钧福 读刘朝驹的《文革史话》（142期 /10月31日）
- 袁洪权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时期的《萧军日记》（142期 /10月31日）
- 陆 凌 《一九六零年》前言、第一章（142期 /10月31日）
- 胡宗式 从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143期 /11月15日）
- 李伟男 九零后观文革——来自一个非亲历者的视角（144期 /11月31日）
- 李 逊 张春桥和《有感》（144期 /11月31日）
- 陆 凌 一九六零年（二）——三年自然灾害（144期 /11月31日）
- 徐海亮 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145期 /12月15日）

聂树人 “文革回忆录”可信度之我见——兼评《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失实（145期/12月15日）

文 研 戚本禹说：周恩来的“这个办法不行”

——对《王大宾回忆录》中有关史料的解析（145期/12月15日）

陆 凌 一九六零年(三)——与苏联无关（146期/12月31日）

【版画】

胡杰 父亲“畏罪自杀”（134期/6月30日）

胡杰 晚上在窑洞里偷着吃（136期/7月31日）

胡杰 给一个馍，领一个媳妇，两个人就是一辈子（138期/8月31日）

胡杰 为了孩子，饿死也不肯倒下的妈妈（140期/9月30日）

胡杰 在杨海棠家的墙上，毛主席像挂了很多年了（142期/10月31日）

胡杰 嫂子问：“你怎么才来？”就咽下最后一口气（144期/11月31日）

【随 笔】

印红标 西纠成立日期考（124期/1月31日）

启之 “脱裤子”·“割尾巴”·“洗手洗澡”——“红色话语”小议之一（124期/1月31日）

胡庄子 读萧军日记（一）——日记中毛泽东等高级干部的形象（124期/1月31日）

胡庄子 读萧军日记（二）——日记中记述的延安的“负面”现象（125期 2月28日）

邵小鹰 谢静宜的回忆与“七·二七”事件（125期 2月28日）

启之 胡杰和他的版画——“祖国”：Fatherland & Motherland（125期 2月28日）

江芬芬 我的杰——他用纪录片和绘画来总结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125期 2月28日）

胡杰 答客问——关于版画《种子》（127期 3月31日）

胡杰 这些画就要离开我们了（127期 3月31日）

马昌海 阅读与思考——有关“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127期 3月31日）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三）——萧军对党人的观察与期待（127期 3月31日）

启之 滑溜溜的委婉——“红色话语”小议之二（127期 3月31日）

- 马昌海 湖北天门民歌《想起往日苦》《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128期 4月15日）
- 胡杰 绘画何为？——关于伊娃这本书的插图（129期 4月30日）
- 启之 暗语变形记——“红色话语”小议之三（129期 4月30日）
-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四）——在入党问题上的犹豫与矛盾心理（129期 4月30日）
- 马昌海 歌声中的暴力——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红小兵越战越坚强》（130期 5月15日）
- 启之 套话种种——“红色话语”小议之四（131期 5月31日）
-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五）——萧军笔下的延安文化人和文艺界（131期 5月31日）
- 依娃 胡杰大饥荒组画的视觉冲击（131期 5月31日）
- 胡宗式 答郑实的质疑（133期/6月30日）
- 启之 江青与电影指导委员会（135期/7月15日）
- 韦陀 蓝喷不是蓝苹——江青笔名考（135期/7月15日）
- 李嘉树 安徽首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建成记（136期/7月31日）
-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六）——文学的雄心与内心的战斗（136期/7月31日）
- 启之 革命的用法——“红色话语”小议之五（138期/8月31日）
-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七）——一个巨大的挑战（138期/8月31日）
- 刘 若 非常年代（139期 /9月15日）北大文革专辑（五）
- 胡庄子 毛泽东、萧军与王实味（140期/9月30日）

【访谈】

- 戴为伟整理 冷卫口述（一）——文革中的贵阳中学（124期 /1月31日）
- 阿陀采写 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125期 /2月28日）
- 戴为伟采写 冷卫口述（二）——山寨插队（125期 /2月28日）
- 戴为伟采写 郑仲兵口述——文革之我见（127期 /3月31日）
- 戴为伟采写 冷卫口述（三）：读书会（127期 /3月31日）
- 戴为伟采写 冷卫口述（四）：西单民主墙（129期 /4月30日）

依娃 寻找我的姨婆、舅舅和小姨(129期 /4月30日)

依娃 我是逃荒者的后代(131期 /5月31日)

依娃 姑侄五人皆逃荒(134期/6月30日)

杨东晓 留学中国：一个奇怪而矛盾的国度——沈迈克口述(134期/6月30日)

依娃 逃荒的未婚女子(136期/7月31日)

张彦 在中国遭到隐匿的历史——采访纪录片制片人胡杰(136期/7月31日)

依娃 一个馍领回来一个媳妇（访谈）(138期/8月31日)

依娃 陇西逃荒人王兰芳访谈（140期/9月30日）

依娃 甘谷逃荒人杨海棠访谈——你领上娃娃逃命去（142期 /10月31日）

依娃 寻找逃荒的妇女娃娃——李桂兰、刘玉芬、刘慧霞、牛玉凤访谈（144期 /11月31日）

【序跋】

丁东 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文革在山西》序(131期 /5月31日)

何蜀 民间研究文革的可喜成果——《文革在山西》序(131期 /5月31日)

启之 “思痛”之华——《云南文革笔记》读后（140期/9月30日）

文研 《王大宾回忆录》的新视角、新观点（序一）（142期 /10月31日）

【述往怀人】

朱特 插队的那些事（七）——去兵团的故事(124期/1月31日)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六）——我与文革(124期/1月31日)

海鸥 大串联见闻（一）——农业学大寨(125期/2月28日)

朱特 插队的那些事（八）——雨村的日子(125期/2月28日)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七）——乱世读书(125期/2月28日)

李南央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上)(126期/3月15日)

李南央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下）（128期 /4月15日）

高嘉陵 高忆陵 我们的妈妈（126期/3月15日）

朱特 插队的那些事（九）——小营子的“反革命”（127期/3月31日）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八）——北师大的同学（127期/3月31日）

田小野 北京女一中文革纪事（128期 /4月15日）

李南央 献给“三线”的青春（129期 /4月30日）

朱特 插队的那些事（十）——田家两兄弟与“借”萝卜的故事（129期/4月30日）

安希孟 北师大文革琐忆（129期 /4月30日）

顾土 我在文革中接受的“未成年人”教育（130期 /5月15日）

朱特 插队的那些事（十一）——夜半对歌（131期 /5月31日）

安希孟 我丧失过阶级立场（131期 /5月31日）

崔龙浩 土改工作队队长与地主女儿的婚姻（134期/6月30日）

安希孟 文革纪略——偷桃与爱书（134期/6月30日）

徐米甘 北京西郊纺织大院回忆（一）（134期/6月30日）

朱特 插队的那些事（十二）——看地的营生（136期/7月31日）

徐米甘 西郊纺织大院回忆（二）（136期/7月31日）

胡双宝 关于高考录取的回忆片段（137期/8月15日）

唐振权 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的“教育”（137期/8月15日）

马昌海 追忆三线“五·七”厂（一）（138期/8月31日）

朱特 插队的那些事（十三）——雨村读书（138期/8月31日）

陈金松 北大汉中分校琐忆（139期 /9月15日）北大专辑五）

王丕忠 镇反纪实（一）——缘起（140期/9月30日）

马昌海 追忆三线“五·七”厂（二）（140期/9月30日）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之（二）监禁和审讯（142期 /10月31日）

- 马昌海 追忆三线“五·七”厂（三）（142期 /10月31日）
- 贡安南 怀念与思考——我的老师杨晦先生、赵齐平先生（143期 /11月15日）
- 陈金松 北大汉中分校的一段生活回忆（143期 /11月15日）
- 俞小平 文革高潮，书山探宝（143期 /11月15日）
- 俞小平 我参加了1966年7月29日的大会（143期 /11月15日）
- 何子溪 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废品收购站寻宝记（143期 /11月15日）
- 叶成炯 令人难忘的收音机（143期/11月15日）
- 漂木 军垦农场里的“性”——大学生“再教育”中的“四不准”（144期 /11月31日）
- 慰 祖 家世拾零——我的爹爹和父亲（一）（144期 /11月31日）
-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之（三）——提篮桥监狱（144期 /11月31日）
-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一）——“反干扰”时期（145期 /12月15日）
- 万天丰 回忆“六二零事件”（145期 /12月15日）
- 唐国权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145期 /12月15日）
- 慰 祖 家世拾零（二）——我的爹爹和父亲（146期 /12月31日）
-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四）——皖北治淮（146期 /12月31日）
- 王金锐 我的自述（一）——十年苦难（146期 /12月31日）

【简 讯】

- 田三分 “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国际研讨会在法召开（124期/1月31日）
- 常 林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两卷本在香港出版（124期/1月31日）
- 韦 陀 《当代中国研究》征稿启事（125期/2月28日）
- 梁幼志 复旦大学召开“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125期/2月28日）
- 谢静文 《马思聪蒙难记》在香港出版（125期/2月28日）
- 韦 陀 周孜仁著《云南文革笔记》在台出版（140期/9月30日）

【文摘】

金灿然 中学地理教本中的几个政治思想问题（1950年5月3日《人民日报》，128期 /4月15日）

李德凤 我初步认识了自己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128期 /4月15日）

扬子浪 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132期/6月15日）

丁凯文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135期/7月15日）

余汝信 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二（135期/7月15日）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137期/8月15日）

北京市文艺界学习运动进入思想检查阶段（137期/8月15日）

山东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思想改造学习（137期/8月15日）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委会举行自我改造学习动员大会（137期/8月15日）

米家农著 《我与“9/13”》一书摘选（138期/8月31日）

1/我的申明（1980年8月31日）

2/《我向党的认罪书》（1980年9月15日）

3/关于“战斗小分队”问题

阮 哲 文革中军队大院放的内部电影（141期/10月15日）

李中石 一部从未公映的文革影片——舞台艺术片《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141期/10月15日）

王大宾 回忆毛主席的召见，反思对我们的批评（145期/12月15日）

【资 料】

陶鲁笳传达最新指示：“今后不许打人”（124期/1月31日）

附：卜伟华对毛泽东说的“今后不许打人”的论析（124期/1月31日）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五）（124期/1月31日）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六）（125期 /2月28日）

高教部《北京公社》红岩战斗队 高教部七一战斗队

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

——彻底清算十七年来高教工作上的修正主义黑线（初稿）（续完）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二战斗队 刘少奇的黑手伸向教材编辑工作一例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小米加步枪》战斗队、中宣部彻底摧毁阎王殿革命联合委员会教育批判小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改资料组：

刘少奇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根子

——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 160 例(126 期/3 月 15 日)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给毛的致敬电（1949 年 10 月 3 日）(127 期 /3 月 31 日)

中苏友协总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49 年 10 月 5 日）(127 期 /3 月 31 日)

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给毛泽东同志的致敬电（1953 年 10 月 6 日）(127 期 /3 月 31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组训革命师生联合指挥部(128 期/4 月 15 日)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天津延安中学是怎样复课闹革命的(128 期/4 月 15 日)

哈尔滨市工程小学革命委员会斗私批修 复课闹革命(128 期/4 月 15 日)

教育革命战讯教育部革联召开座谈会讨论教改中存在的问题(128 期/4 月 15 日)

北京第一机床厂“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 年 1 月 12 日）(129 期/4 月 30 日)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 年 1 月 22 日）(129 期/4 月 30 日)

途经莫斯科的全体国外留学生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 年 1 月 27 日）(129 期/4 月 30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 年 2 月 10 日）(129 期/4 月 30 日)

北京第一机床厂“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 年 1 月 12 日）(129 期/4 月 30 日)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 年 1 月 22 日）(129 期 /4 月 30 日)

途经莫斯科的全体国外留学生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 年 1 月 27 日）(129 期 /4 月 30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

电（1967年2月10日）（129期 /4月30日）

军工红色造反团遵义兵团、红宝剑战斗队

戳穿党内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曹鹤荪狼狈为奸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130期 /5月15日）

军工红色造反团《红宝剑》战斗队

是“超政治”的教授，还是美蒋反动派的走狗——剥掉曹鹤荪的几张画皮（130期 /5月15日）

四系402教研室全体同志 愤怒控诉反革命分子吴鸿钧疯狂攻击毛主席，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130期 /5月15日）

本刊记者 对吴鸿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30期 /5月15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2月22日）（131期 /5月31日）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3月22日）（131期 /5月31日）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3月27日）（131期 /5月31日）

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

周年讨论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6月5日）（131期 /5月31日）

章 铎（抄录）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中的聂元梓和孙蓬一（133期/6月30日）

新北大东风兵团编印 新北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十月初一——十一月底（初稿）（133期/6月30日）

路远、周闯 搬开聂元梓 北大才能乱（133期/6月30日）

杨 勋 北大文革又处在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133期/6月30日）

虎山行战斗团 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133期/6月30日）

聂元梓 在纪念“六·一”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33期/6月30日）

亚非作家局纪念《讲话》25周年给毛的致敬信（1967年6月5日）（134期/6月30日）

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师《过河卒》战斗组成员安文江等四人给毛主席的信（1967年7月13日）

附：我们的决心（134期/6月30日）

首都中学志愿去边疆插队的革命小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11月）（134期/6月30日）

复旦大学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25日）（134期/6月30日）

不平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 (1972年5月12日)(136期/7月3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关于严禁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

(1967年11月27日)(136期/7月31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关于给公安系统选调复员战士问题的批示》

(1968年4月13日)中发〔68〕59号 (136期/7月31日)

《解放》、《肯登攀》、《众志成城》、《放眼量》 大事记编写小组

北师大女附中 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137期/8月15日)

北师大女附中《劳动》第二期(1960年11月30日)(137期/8月15日)

沈阳一中实现革命大联合庆祝大会给毛的致敬电(1968年2月8日)(138期/8月31日)

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向毛暨党中央的致敬电(1968年3月3日)(138期/8月31日)

长丰县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的致敬电(1968年5月1日)(138期/8月31日)

孙蓬一等人的“一·二七”大字报(139期 /9月15日)北大文革专辑(五)

孙蓬一的检查及工宣队的批语(139期 /9月15日)北大文革专辑(五)

1967年1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140期/9月30日)

1967年1月13日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40期/9月30日)

孟犁野辑录、整理、评注:关于影片《荣誉属于谁》的一组史料(141期/10月15日)

1967年1月26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42期 /10月31日)

1967年2月2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42期 /10月31日)

1967年2月6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42期 /10月31日)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1967年4月14日)
(143期 /11月15日)

陈伯达 1967年6月5日的讲话(143期 /11月15日)

1967年2月22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44期 /11月31日)

1967年3月2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44期 /11月31日)

1967年4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44期 /11月31日)

薄一波对北京地质学院问题的批示(1966年6月22日)(145期 /12月15日)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年8月17日)(145期 /12月15日)

北京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04/21)(146期 /12月31日)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08/13)(146期 /12月31日)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11/2)(146期 /12月31日)

李 逊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后记(125期 /2月28日)

(附录)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目录(125期 /2月28日)

【读者来信】

- 汪春劼的感想(124期/1月31日)
- 庄菁瑞、邵小鹰谈辛逸的《新瓶装旧酒》一文(124期/1月31日)
- 袁洪权谈124期之得失 • 孙沛东谈李南央之文(125期 /2月28日)
- 阿陀自我正误 • 庞国义纠错 • 予庆指谬 • 张晓良感想(126期 /3月15日)
- 小庄谈“狼奶” • 国庆谈“狼奶” • 张晓良纠错(127期 /3月31日)
- 读者谈李南央之文 • 李彤谈“狼奶”的讨论 • 编者声明(128期 /4月15日)
- 越人谈李南央之文 • 张晓良谈128期的误植 • 别题谈感想
- 慰祖谈李南央的“五个面向”及湖北天门民歌
- 刘建业谈任国庆之文 • 任国庆答刘建业先生(129期 /4月30日)
- 叶维丽谈“清华工宣队”一文(130期 /5月15日)
- 谢定国谈自己的文革日记(133期/6月30日)
- 李逊为《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的重要差错勘误 • 越人、汪春劼谈王海光文 • 张晓良纠错(134期/6月30日)
- 许绍英提醒《记忆》注意学术规范 • 胡泊纠错 • 周元龄纠错 • 张晓良谈《纪念白求恩》及陈仁

德咏江青诗·蒋健置疑·安徽大学教师李嘉树征集安徽文革史料(136期/7月31日)

·孙柏青、吴越谈王海光《答客问》，批评本刊违背首发之约·《记忆》答孙柏青、吴越·陈小穆谈王海光《答客问》·予庆谈江青研究·陈闯创谈134期(137期/8月15日)

·迈克：“反革命社会基础”是谁发明的？·徐光胜谈“帮派史学”(138期/8月31日)

·蒋健纠错·贡安南谈感受·张晓良、庄重远、杨光谈封面设计(139期/9月15日)

·漂木谈章铎文·吴越谈《记忆》首发·范世涛答吴越来信·谢定国正误(140期/9月30日)

·张从、章铎纠正139期之误·赵欣、张超越谈《镇反纪实》(141期/10月15日)

·敖本立纠错·漂木谈章铎所著《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一文·荷兰小庄谈当年看电影·拾之：电影局所在地非冯恕所捐(143期/11月15日)■

【版权声明】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